

新思潮

月刊

Hsin Szu Ch'ao

第九期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訂價一元



中共恐嚇

封閉民主牆

市民大眾要支持公務員

強權壓不了真理——

反對中共對民主牆

施以任何形式的管制



胡愈

西單民主牆，一直是北京之春的象征，也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公開民主論壇。然而，今天它却被中共污蔑，並恐嚇要封閉或管制它了。

十一月廿六日，鄧小平還對外賓表示，他支持民主牆的繼續存在。然而，三天之後，中國人大常委會就斥責有人利用民主牆來進行「違法活動」，責令北京市革委會「採取適當措施，予以解決」。三十日，北京市革委會就依令行事，負責人暗示要封閉民主牆，說不能再讓這個情況繼續下去了。

這是繼今年十月中共拘控民權分子魏京生以來，最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迫害行爲。過去中共沒有大規模拘捕民主運動的領袖，而只限於對個別分子（魏京生、傅月華、任曉町等）孤立打擊；今次中共封閉民主牆，卻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全面鎮壓。受影響的不再是個別分子，而是所有人了。北京之春產生以來，民主牆幾乎成爲所有民主團體的公開論壇。在這個論壇上，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人權分子。總之，任誰都可以發表意見。中共今天掄起斧頭，一舉就砍掉了這個論壇，於是任誰也不能發表意見了。錯誤的自不消說，就連正確的意見也不能讓人民聽到了。

人大常委會和北京革委會要誣蔑民主牆的理由，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人大常委會認爲有人利用民主牆「進行違法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干擾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革委會的負責人尤進一步，指斥「魏京生之流唯恐天下不亂，利用「西單牆」大造反革命輿論，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安定團結」，甚至「出賣情報」，「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中共這個講法，非常含糊空洞。究竟這些「反革命分子」是什麼人？人數多少？是不是所有張貼大字報的都是反革命分子？中共搜集了什麼人証物証來支持這些罪狀？如果有證據的話，爲什麼不公佈出來？

這可真是拿中國人民來開玩笑，彷彿一年多以來民主人士對於寫大字報有特殊偏好的。其實，如果他們確有可行途徑，他們又怎會捨近而圖遠呢？正是人民投訴無門，才被迫用最原始的方式表達意見。中共所謂組織系統，不過是塊遮羞布而已。試問什麼「組織系統」呢？人民代表大會嗎？對不起，這些代表不是民選的，不必對人民負責。宣傳媒介嗎？也對不起，所有報紙、電台都是官辦的，人民沒有新聞自由。黨組織嗎？你連想也不要想！憲法上規定人民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誰不這樣就得像魏京生那樣被迫害。中共以爲指出了一條生路，其實是條死路！

還有，按照中共的一貫做法，犯了上述的罪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是要法辦的，就像魏京生那樣。那麼對於這一批「反革命分子」爲什麼也不抓起來呢？最後，犯罪的是人，不是這堵牆，爲什麼却先封了牆呢？難道是這堵牆進行了反革命活動，所以要予以法辦嗎？

中共對於這些問題沒有答案，也根本不可能有答案，因爲這些罪名之偽造，是完全明顯不過的。中共之所以要這樣做，首先還不是由於「魏京生之流」，而是由於民主牆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釘。民主牆這個講壇，一直是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喉舌，也是最能透露國內的真相，揭發社會黑暗的場所。這些從人民心底發出來的呼聲，比官辦刊物所發起的合唱更親切些。這一切都是令中共無法忍受的。因此它一定要下決心拔取眼中釘。尤其當它發覺，迫害魏京生並不能嚇怕民主運動的時候，中共唯有用更粗暴的方式去壓制人民。

還有些革委會的負責人說，人民根本不需要民主牆，因爲「發揚民主的渠道是很多的，有意見可以按組織系統反映。」誰不這樣做，誰就是滋事分子。

中共口口聲聲說，爲了安定團結，爲了四個現代化，就必須鎮壓言論自由。這是明明白白的欺騙。過去卅年的苦難，恰恰是由於沒有人身自由和民主。四人幫之當權，也正是由於沒有人敢反對他們。今天中共沒有真正總結教訓，連這丁點自由也想扼殺了，那麼，中國就完全可能重新被四人幫式的官僚所控制，四個現代化也就遙遙無期了。

中共還沒有說明究竟如何解決民主牆，還只是含糊地說，不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了。所以中共有可能不正面封閉民主牆，但「管制」它，不許有批評中共的大字報貼上去。對於這個做法（如果真的出現的話），我們也決不會同意。因爲這同封閉無異。如果中共要證明自己並不是獨裁者，至少首先要維持民主牆的完整性，不予任何限制。任何限制都是鎮壓民主。

言論自由，是四個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之一。沒有言論自由，就不能做到人人富裕、平等。因爲，第一，四個現代化是無比艱鉅的任務，非有效發揮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意力是不行的。而創意力，只當在人民獲得充分的言論自由才有可能發揮出來。第二，爲了避免中國重新經歷四人幫式的浩劫，中國人民必須加強對統治者的監督和批評，使統治者的每一個政策確實符合多數人民的利益。如果像中共那樣扼殺言論自由，人民就不可能監督統治者。統治者就只會更容易、更迅速地脫離人民，再而壓迫人民。

民主牆過去一年的存在，也完全証實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許多時，民主牆上的言論要比中共更正確、更有先見。例如，早在中共正式平反天安門事件之前許多個月，就已有有人在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主張平反天安門事件。至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呼聲，就更不用說，早已有人在民主牆上提出來。很久之後中共才拾人牙慧，加入人民的合唱中。此外，對四人幫、毛澤東思想的批判，也都出現同樣情況。可見民主牆確實是有價值的，它讓有先見的群眾提出正確的主張，讓人民參考。

當然，也有些反馬克思主義的人在那裡發表意見。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不能用暴力糾正錯誤思想。其次，不應該強迫別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如果中共確信自己正確，爲什麼不敢在人民面前同這些人公開爭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難道擁有數千萬黨員、和無數宣傳機器的中共，還怕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爭辯嗎？

民主牆協助人民解放思想，這是一個無名氏在十二月二日在大字報上說的話。今天，中共要封閉（或管制）民主牆，決不能捂住人民的嘴巴；適得其反，中共這次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所吹噓的「民主與法制」，是多麼虛偽，多麼可笑！中共自己一直鼓吹解放思想，鄧小平也一再保證不干涉民主牆。但這個決定，却撕毀了中共自己的諾言，就表示了中共是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的官僚。這是對人民的很好的教育，其作用甚至要比一千張呼聲民主的大字報還有效。

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已不再是無聲的中國了，中共以爲禁止人民自由張貼大字報，就可以不受到批評，這不過是鴛鴦政策而已。民主牆是不死的。

十二月四日

參加我們的行列！

支持配藥員的法律行動！

何國英

目前，政府正在開始更進一步的利用公務員工會間分散的弱點，對個別較爲孤立、力量較小的工會施以強硬手段，希圖壓服近月來的工潮。十一月二十九日，它對怠工中的配藥員發出了最後通牒，敕令他們馬上復工。當廿二名配藥員繼續堅持其行動時，當局即予以他們停職的處分。當此緊急關頭，配藥員和其他工會不但沒有退縮起來，還集合了三十八個工會之力，反對港府無理停職，並作出徵集鬥爭基金、準備集體行動等聲援。這個初步的團結，實在是令人可喜的。

當局是引用銜敘條例六一條來處分配藥員的：「任何公務員與勞資糾紛有關，而在一段時間內拒絕或怠忽執行其職位一貫職務或其中部份，則可能會遭銜敘停職，並於停職期間內，不獲發予薪金。」一望而知，這條例是任何工會都必須徹底反對的，它完全否定了公務員有罷工、怠工的權利。而且銜敘規例全都只由港府單方面制定，職工不但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甚至連徵詢意見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條例究竟對誰有利，爲誰服務的，可想而知了。

現時，配藥員工會決定將此事入稟高院，控告當局違反合約；同時，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致認爲勝訴的機會很大。無疑，法律行動是一個可行的鬥爭方法。譬如在七六年四月丈量員也曾就按章工作被扣薪一事，入稟法庭

，最後上訴得直的。不過，如果僅僅因爲法理上我們是對的，便把一切希望寄託於同時作爲裁判人和被告人的港府，指望它會作出公正的判決，那是沒有把握的。事實上，當局對配藥員的鐵腕手段，已充分的表現了它的鎮壓的決心。他當然不願看見配藥員勝訴的，同時更害怕因此而鼓勵起來的其他工業行動。所以，除非在工會團結的龐大壓力而做成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是不會屈服的。由此看來，各工會能否繼續加強團結，作出集體的支援行動，就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了。

不過，當局一定看見公務員的團結對它是不利的，一定企圖分散它，並首先阻止它們採取聯合的行動。譬如借口說：由於案件已入稟高院，期間若有任何行動，都有碍司法公正等等，來禁制公務員的一切行動。我們不可上這個當，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內爭取宣傳和行動的機會。

配藥員控告政府，必然引起更多市民對公務員工潮的關注，這正是一個向市民解釋和宣傳的好機會。特別是港府現時停止了七間診所的夜診，企圖煽動起市民對配藥員的憤懣情緒，我們更要主動的解釋清楚這完全是港府的分化手段，爭取廣大市民的支持。那才有勝利的可能。

十二月四日

無論是第一次接觸或已經看過新思潮的你，可會對這份刊物發生興趣？可會想過進一步了解它？

新思潮是一份激進青年刊物，它站在青年人的一邊，尋求一條思想出路，從而加深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除了思想的探索外，我們還積極地參與群眾運動，爲爭取群眾權益而奮鬥。親愛的讀者們，假使你成爲我們的通訊員，你就可以與我們共同工作，並肩前進。

作爲一個通訊員，你可以：

- (一) 投稿：不論你是否有寫作經驗，我們都鼓勵你多點寫作。我們會盡力幫助你。
- (二) 採訪：我們會安排採訪一些社會事件，從而擴大我們的視野。
- (三) 參加新思潮主辦的活動：我們會就思想、人生觀等等問題主辦座談會或演講會。
- (四) 與新思潮一起參加群眾運動：你記得金禧復校運動嗎？新思潮當時爭取了少量讀者一同參加金禧同學的不懈鬥爭。參加群眾運動，將能使你更快地成熟起來。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學校／職業：			
地址：			
電話：			

(接第八版)

- * 五十年代支持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和近百萬阿爾及利亞人的大屠殺；
- * 五一年支持美帝入侵韓國；
- * 五六年聯同英、法入侵埃及；
- * 五八年支持美帝國入侵黎巴嫩；
- * 支持美帝入侵越南。

這都是以以色列種族主義制度的邏輯結果。因為以色列要長期地把阿拉伯人貶為二等公民，就必然要加強鎮壓，也就必需要依賴帝國主義的支持，成為其中東的代理人。以色列每年得美援近一兆，它還最少有十三個核彈頭，不單能攻擊阿拉伯鄰國，其射程還遠及蘇聯在歐洲南部的城市。中東之成為世界的火藥庫，不但是對阿拉伯人民的威脅，也是猶太人的悲劇。無論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也不能容許這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制度有存在的權利，而應該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

- ①國際社會主義者評論，一九七一年一月。
- ②洲際通訊第十三卷十二號，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③洲際通訊第十三卷二十六號，七五年七月七日。
- ④洲際通訊第十五卷三十八號，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 ⑤「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每日評論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附註一：薩克教授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有機化學系的教授，他原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在德國納粹囚禁集中營，四年移民巴勒斯坦，六七年六月戰爭的事變使他放棄了立場。他在以色列進行反歧視非猶太人的活動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國會曾對他的問題進行辯論，有人建議把他驅逐出境，取消公民權，但大概這樣對待一位猶太人會令以色列政府過於尷尬，所以沒有付諸實行②。

附註二：防衛條件原是英殖民政府在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鎮壓巴勒斯坦人起義時訂下的。其中如第一四二條規定：「任何人企圖，以講話或其他方式，影響公眾意見，其態度似乎是對公共安全，防衛或維持公共秩序存有偏見的」，會被認為是犯罪。第一〇九條中規定可以基於某人與其他人的交往和聯絡，和某人有新聞和宣傳意見的活動」，而限制其行動。

(接第2版)

所以，新財政調整，實質上並沒有對居民近年來的反貴租的要求作出實質的讓步。報告書一出，房屋署長黎保德便已興高彩烈地安排加緊建屋大計，不但是一般的公共房屋，還包括「居者有其屋」的售樓大計啦！

由報告書着手草議以至完成，最直接影響的屋邨居民竟完全排斥於外，祇是由屋委員屬下的一個小組負責。葉錫恩指責此報告書是閉門造車，違反居民意見，更大爆租金政策小組的內爆。她指出報告書未出籠之時，她共參加了十四次租值政策會議，但每次會議祇得小貓一兩隻，根本無所謂對報告書作出討論，而且亦無權決定，她更指出，該小組主席曾聲稱，釐訂公共屋邨租金，應以私人樓宇租值的一半為準則，不管任何人提出抗議，亦無注改變……這決定雖有其中三位委員反對，但該報告書最後仍以此為定案，由此可見，香港政府為了推卸其承擔公共房屋作為社會福利的責任，是不肯聽取反對意見的，強詞奪理不成時，就索性拋開「聽取民意」的假面；對影響達一百八十多萬居民的租金政策，連綠皮書也不出版，讓房屋可施格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就算交待了事。

新租金政策報告書面世後，立即引起反響，由廿多人屋邨居民組織和熱心社團所組成的「公共房屋租金政策行動委員會」於十一月十三日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提出四點要求：(一)重新組織一個由熟識房屋政策和對屋邨實際情況有認識人士為首的委員會來制訂公共屋邨的租金政策，而委員會應包括現時公屋的居民代表在內，(二)制訂租金建議書應以綠皮書方式，讓社會人士及有關居民提供意見和討論，(三)對公共屋邨的租金及差餉不能以私人樓宇作比較，公共房屋實為一項社會服務，(四)新租金政策對免息貸款及免費土地用途及處理方法，並沒有詳細解釋。

從以上要求看來，政府獨斷獨行的不民主作風，已為市民大眾所給病了。越來越多居民明白到，祇有代表他們的居民代表參與，才會制訂合乎居民利益的租金政策來！

陳若子

每年的上半年，為數一萬八千人的預科生便開始進入緊張階段，以應付在年中舉行的兩間大學的入學試。大學學位的缺乏已是一個不用爭議的事實，就以中文大學為例，每年應考生不下九千人；競爭一千個學位。每一個考生必需經歷過一場以一敵十的嘶殺，才能夠踐踏着失敗者的殘骸走進高等學府的窄門。雖然，還有三間教育學院和近年大張旗鼓的理工學院可供選擇，但在官、津小教師職業保障汲汲可危，三師同學憂慮多時的出路問題懸而未決的今日，對一些志不在理工科的同業而言，兩間大學仍是他們尋求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而一些由私人機構設立的大專院校，也在大學學位僧多粥小，高等教育需求殷切的情況下應運而生，提供預科畢業生多一條出路。

目前，香港正式註冊的私立大專有兩間：浸會和樹仁；合共提供了四千五百個就讀機會。均為全日制，四年完成的文憑課程。學科方面以浸會為例，分理學院、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廣泛性可直追兩所大學。但，這些私立大專均有二個共通性：(一)學費高昂，由於政府對這些院校不作任何資助，學院一切開支主要靠學費維持。(二)地位備受歧視，香港政府身先士卒，在政府機構工作的私立大專畢業生的起薪點，低於兩所大學，而一般私人機構，除了兩所大學未及設立或在草階段的專業學科外，私立大專畢業生的薪酬往往是矮了一截。私立大專的同學付出高昂的學費，以同樣的精力和時間，但，無論在師資，教學設備，學舍，以至畢業後的出路、薪酬各方面均遠不如人。而一些還未獲承認的大專(如珠海、嶺南等)，其情況更比浸會、樹仁為差。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香港政府不但不加以改善，在最近發表的「高等及專上教育綠皮書」中，更進一步肯定了過去的政策。

首先，綠皮書不得不承認私立大專有其存在的客



觀條件。它說：「除非大專及理工學院能加以擴充，使學額比現時計劃中的為多，否則學生仍將繼續進入專上學院就讀」。這個結論是不講自明的；因為，兩所大學每年提供大學一年級學位祇有二千一百個，佔全港適齡青年祇有百分之一。九，相對起每年一萬八千多的預科畢業生，亦祇能佔份之十一。七而已。即使包括理工，護士學校和教育學院，這些由政府提供或全數資助為學院，亦不過提供了一萬五千八百個就讀機會。顯然，現時的學位，是遠遠達不到學生的需求，但綠皮書却大不理會高中生的願望，確認：「政府不擬改變這些學院的私立地位，亦沒有使其得以維持下去而作任何承擔。」對於有三千多學生的私立浸會書院，政府最大資助祇是「向浸會學院學生提供免息貸款計劃」，對有八百多學生的樹仁更不會……對該學院或其學生以貸款方式提供任何經濟援助。」而且，綠皮書還實際上將兩所私立大專的地位，降低到介乎於中學六年級高級程度與大學學位之間，在以前，浸會樹仁的同學雖然一直受輕視，但還算可與理工學院的水平同等，但現在就是確定了它們的次等公民地位，政府態度則是不聞不問，無意改善。

政府所提出「歧視有理」的論據是：第一就是在未來十年中，大學學位將會增加，原因是政府「設法擴展兩所大學」，和「十七歲及十九歲之人口將會減少」。第二是指出私立大專均屬人文學科及非其他技術性科目，不能與提供職業資格課程的理工可比，所以「現有政府資助的學校比專上學院更能滿足學生之需求」。

現在，讓我們去看看政府擴展大學鴻圖大計罷！在四年後(八一年)，兩所大所提供第一年的學位由現有的二千一百增至二千七百，十年後(八六年)不

過是增至三千一百人而已。理工學院，由於目前正符合資本家「工業多元化」的計劃，其增長則將較快，會由現時全校一萬二千增至一萬五千九百人。到時全港受承認的專上學生總數亦不會超過二萬人。但現時私立大專(包括註冊與未註冊)，所提供第一年的學位需無正式統計，但根據七六年的資料顯示，全港私立大專共有學生三萬人，浸會一校就已與中文大學差不多了。由此可見，如果政府立時資助各私立大專，以提高師資和設備，並承認其大學學位資格，那末，大學學位的數目便立時倍增，不需期之以十年了。

對於指稱私立大專學科純粹為人文科學，浸會書院校長謝志偉已在一次座談會中，公開指斥政府所言不符事實，即如上文所說浸會學院是包括理工科及專業訓練。但即使政府所言屬實，却完全不足以作為輕視私立大專的口實，因為學生亦有機會去選課，作為專材訓練的專上教育，理應廣設學科，以供不同志趣的學生選擇。但，政府近年來大事擴展理工學院和興建工業中學，而兩間大學學位這兩年竟無增加，這次更以偏重人文科作為口實，拒絕資助私立大專，可見政府教育政策，祇是配合工業發展的趨勢，和適應工商界日益高漲對高級技術和管理人員的需求。綠皮書說專上學院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正確應該是不能滿足大廠主，大商家的需求罷了。

私立大專的產生，是由於大學學位不足所致，而師資、出路均不如政府資助的大學，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專能存在至今，可反映出青年人對高等教育渴求的殷切。如果同學驚怪於政府何以不厭其煩地把高等教育分等分級，人為地製造差別；或者對政府何以捨近求遠，拒絕以現有私立大專的基礎來擴充大學學位，那麼，我們祇要把私立大專問題連繫到整個教育政策來看，便會昭然若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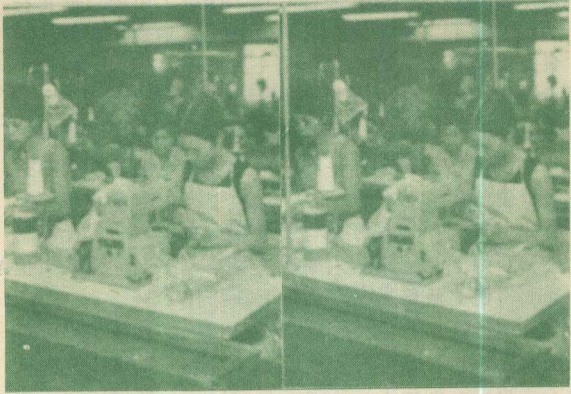
香港教育政策的設計，是以一個金字塔形式向上發展，在金字塔頂端的專上教育，只為一小撮人所享有。而在這一小撮中又劃分等級，中大不如港大，理工又不如中大，註冊私立大專又不如理工，等等……，一層一層劃分，界限森嚴。而在中學教育方面，搬出一套中三淘汰試將中學教育腰斬，剝奪了百分之四十的初中生升學的機會。對小學生又以一次學能測驗來評定優劣，送入不同的中學就讀。可見，政府的等級政策，不論在大、中、小學皆是一貫的。

教育上劃分等級實質是將人劃分為若干不同的社會等級。綠皮書徵引一九七六年「副人口調查申報資料」，發現全港工人中，僅有百分之三的工人受聘為技能水準相等於技師級的工作，百分之九工人受僱為技術員或同等工作，百分之二十六工人為技工，而絕大部份(百分之六十二)受僱為操作或非熟練工作。以此資料所反映出來的既成現實，香港政府於是設計一個教育政策，就是去供給那百分之三接受高等教育使之成為技師級人員，百分之九理工教育……這一種根據市場需要，而不是人的心智發展需要而訂定的教育政策，正是統治者最佳分而治之統治方法，讓受教育的高低，將社會身份高下的劃分合理化。統治者所憂慮的正是：「無限制之擴展專上教育，很容易導致社會不滿現象。」

這個社會本應給予每一個人以機會去發揮他的才幹和興趣，而不是由一小撮政府官員官僚地決定誰可讀書，誰不能讀。任何類似的企圖，都只是一種強迫的「社會分工」而已。

這樣，三萬的私立大大專同學和其他連私立大專也沒有機會就讀的預科生，就被統治者所遺棄。高等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對於昂首以待當年的私立大專同學，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最直接的莫過於註冊私立大專地位一降再降，地位次於中大再降至低於理工，長遠一點的影響，就是綠皮書差不多默許了加學費，而政府對學生之貸款祇是彌補舊學費與新學費的差距，高昂的學費早已使私立大專的同學喘不過氣來，據浸會書院一次調查，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同學需要兼職以繳付學費，將來一旦加費成為事實，同學們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綠皮書強調「政府資助計劃，不會用作增加專上學院目前學生人數」；換言之，是不鼓勵增加私立大專學生人數，即使增加，政府也不加以援手，到頭來，吃苦頭的還是學生。

接受教育是每一個人應有權利，政府應該努力達至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擴大大學學位，而最現成和迅速，莫過於承認私立大專(註冊與未註冊)的地位，在師資和設備上大加資助(因為這些院校師資較低，不外是經費不足)。這些措施，對於每年有大量儲備金運往英國的香港政府而言，是力有所逮的。



來臨中的另一次衰退

一九七四至七五的那一場經濟危機，曾經造成二十多萬工人的失業。經七六年的經濟異常增長（工業出口總值升百分之四十三，比七五年增加十七點七億元，國民生產總額增百分之十六）之後，曾一度令統治階級以為經濟危機已一去不復。但事實上，這一次經濟的復甦是極之不平衡的。其中當然有些行業有大幅度的增長，（尤其是建築業），但對於佔本港工業生產半數以上的紡織染製業，情況却並非如此的。就以織布業為例吧：根據「經濟導報」出版的一九七七年「香港經濟年鑑」回顧七六年時說：「蓬勃一時的織布業（上半年開工率平均達八成），下半年產銷均漸趨呆滯。特別是生產牛仔布的工廠，全行業開工率平均只能維持在正常時期的六成左右；其中，大廠的開工率還可能達到七成，但小廠的開工率有些只得三成左右。大多數織布廠已從每天三班生產減為兩班，停開夜工，有些則在星期六及星期全廠停工。」

進入七七年，紡織和製衣業的衰退就更為明顯。在最初七個月，成衣出口比去年的同期減了百分之五點三，紡織品則減了百分之十六點四，共減少一億元，實際上已降回至七三年的水平。根據政府統計處在過份謹慎的統計中指出，這個衰退，已做成二萬八千五百個紡織和製衣工人失業，而根據其他專業刊物的估計，實際的數目應有三萬七千人。雖然，由於其他行業（特別是服務性行業——財務、金融、地產買賣等）仍然保持業務上升，將這些工人吸收進去，結果只是做成今年九月比去年九月多出約一萬一千名失業者。

不過這並非意味着紡織製衣業工人能夠長期地成功轉業，根據香港統計處發表的今年九月統計數字，連塑膠、電子和鐘錶業，工人就業額已經減少，下降回接近去年的水平；服務性行業吸收新人的速率亦已放慢，從六月至九月工人就業的數字看，就更可以看到失業增加的迅速程度；在這三個月內，工廠工人就減少了一萬七千五百個，同時間只增加了四千二百個服務性的工人。由此看來，雖然目前未能確定另一次衰退來臨的步伐的快慢，但到明年，恐怕衰退就極有可能更壞地顯露出來；那時佔香港工人中半數的紡織製衣工人，肯定就會首先面臨失業的威脅。其中，由於今次共市協議對棉紡影響最大，這行業的工人受打擊可能來得最快最大。

保護主義保護誰？

明顯地，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保護主義，首先打擊的是殖民地世界裏的工人階級。但殖民地資本家當然不會承擔因市場收縮而引起的利潤下降或賠本；一旦某一行業無錢可賺，則他們不是減低工資或提高物價，就是關廠裁員，將資金調往有利可圖的工業。做成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制度，但承擔危機的將是出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現代社會的科技生產力水平，本來是應可做到物價越來越低，工人生活水平越高，勞動強度越小的。但私有制保護資本家的利潤，反而走向回頭路，使工人階級走向危機的深淵之中。

而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資本家，却大條道理地為保護主義政策辯護，他們斷言，保護主義可保衛這些國家內的工人的就業和生活。

這是一個謊言，正如我們下面要解釋到：關廠裁員，主要是由於資本家追求利潤，互相競爭去控制市場、致使利潤率下降，而保護主義其實是國家力量來控制市場的方法；故此，它不單不會製造出就業額，反而讓壟斷了市場的資本家能夠控制物價的偏高，從而削低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因此，工人階級絕不應支持資本家的保護主義政策。

保護主義只能引起兩個一般效果，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的失業，先進國內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對於目前的香港，西歐近期的保護主義又有更具體的意義。

藝美織造廠就是一個例子。當共市協定的影響還遠沒有顯露時（目前，因趕出口今年配額，很多大廠都開工達八成），資產階級已企圖利用來進行立即打擊工人階級的勾當，或者乘此來欺騙工人多作忍讓。敏感的「華僑日報」經濟版就鼓吹說：「

……乘這種「外侮」來刺激我們的團結與努力以和緩工人荒或工人熱誠下降的危機，可能反而是一種無形的好處……」如果用階級的術語，所謂「刺激自我團結」，就是要工人放棄自己的利益與資本家團結；「和緩工人荒」，就是以失業大軍來拉低工資；「和緩工人熱誠下降的危機」，就是要瓦解工人因階級利益與資本家所作的對抗。

港英資產階級中最自覺的份子，就是這樣鼓勵利用保護主義來向工人階級進攻的。

在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並不想將共市協議的影響全部結果讓群眾知道。麥里浩在十月初的「施政報告」中估計會使香港「損失」十億元。工商署副署長估計這只會有一千五百多人失業，但假如這個損失完全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那麼，據「文匯報」的計算，就至少有一萬八千人失業。

不過，情況不單如此，因為紡織業的衰退，遠在共市協議簽署之前就開始。事實上，香港紡織業所面臨最嚴重問題首先是缺乏訂單。今年共市給予香港的限額，相信只能使用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故問題不是限額過低，而是西歐市場被其他地區更廉價的產品所湧入，結果不是香港找不夠訂單和有單亦無利可圖。所以，工業總會總幹事陳樹安比其他人更坦白地說：「長遠而言，紡織業的前景，不會有很大的發展……只要明年的情況可保留七六年的水平，已經值得安慰。」

當前，統治階級圍繞着「保護主義」的叫囂，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煙幕，蓋着一個事實：無論有否保護主義，香港的紡織業因利潤率和競爭力的下降，已無可避免面臨一次永久性的收縮。他們害怕佔產業工人半數的紡織業工人知道這個真相，引起他們保衛自身就業權利的反抗。

弱肉強食

很多社會言論都指出，目前香港經濟發展面對的困難，主要是由於歐美經濟在七六年上半年有了回升，幾乎每一個工業先進國都重新陷入經濟生長放慢甚或衰退之中。對香港資產階級來說，這固然是指出了一個事實，但另一方面也是推卸責任的方法。不錯，西歐先進工業諸國，通貨膨脹仍然以兩位數字高升，失業人數一次又一次創造出新紀錄；到十月時，歐洲共同市場的九個國家的總失業人數已達六百萬，美國一國就有七百多萬。這種危機，致使資本主義世界公開承認未來的黯淡前景。例如，日本大財閥之一的住友商事會在六月對七十五個國家進行過調查之後，發表了一份甚為「悲觀的」報告，宣稱：「世界經濟已陷入自三十年前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時代，勢將會繼續在黑暗中摸索。」

資本主義世界，經過戰後廿多年因「第三次工業革命」、改善生產機械（自動化、電腦化等）而經歷長期的相對性繁榮。但隨着生產機器的改良，生產力之抬高，生產出來的商品就越多，於是做成了市場的相對收縮，市場的競爭就越激烈；另一方面，生產機器之現代化，意味着越倚靠勞動力，而人的勞動力是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人力之減少於商品生產中，亦即是說價格應越低。所以生產力越發展，就造成資本家投資越大（改良機器，購新設備），但相對的利潤（利潤率）却下降。

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時代裏，減低「利潤率」（即所謂「薄利多銷」），本來是資本家爭奪市場的方法。誰最財雄勢大，誰就能降低商品的價格，誰就能爭到買主、奪得市場；誰的資本越少，就倚靠勞動力來生產，除非通過對「廉價勞動力」的超額剝削，否則總是不能與大財團去競爭。於是「大魚吃小魚」，強國欺弱國的弱肉強食就成為資本主義「天然的」過程和法則，「自由競爭」變成了大財團的壟斷。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在本世紀初已經形成。當時，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對此過程作過深入的分析。列寧將此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稱為帝國主義；他在著名的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裏解釋道：「……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世界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的增加，隨着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繫和殖民地聯繫以及『勢力範圍』的盡力擴張，『自然』就使得這些壟斷同盟之間達成全世界的協定，形成國際卡特爾（大財團的一種）。」

「這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無比的階段。……」

「……資本家瓜分世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

香港雖然是一個殖民地，但壟斷的趨勢亦十分明顯。據統計，今年來已有千多家中小製衣廠結業或倒閉，另外有百多間布廠，四間紗廠結業。

以手槍來談判

「迫於無奈」的帝國主義者資本家要繼續控制和爭取市場，在經濟危機的時刻，最初便開始使用「雙邊協議」的方式，美總統卡達達的國際貿易談判代表稱之為「恢復市場秩序的協議」。有人寄望能

夠讓各國去平分春色，「共食一個蛋糕」。因為這種協議，一方面能讓國內受到威脅的產品能夠佔着國內市場，另一方面，由於這些「雙邊協議」是大家同意的，故此又可避免各國互相報復，造成不可歇止的世界性保護主義浪潮。

但是，正如列寧所解釋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早已超越過一國市場的疆界，各自闖進世界市場。資本家是不能自主地要走向全面世界貿易戰的道路的；為了要追求利潤，現在是「文質彬彬」地談判，將來會用戰爭來爭奪市場；這就是人類在廿世紀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現實上，那些「協議」大多數都不是雙方同意的，而是由單方強迫對立執行，否則它也不會被稱為保護主義。以香港最近簽署的共市紡織品協議為例，連署理布政司羅弼時事後也得說：「本港極其勉強及充滿疑慮地接受這個結果。協議內容若干條款是本港不願意接受的。」正確地說，香港是不得不接受，因為：「我們的極可能面對共市不顧一切後果而向本港的產品施入口限制。」

假若如此，這對香港的資本家來說將是一個災難。較為明瞭局勢的資本家就會指出：「本港實行自動限制出口，比由進口國家實施入口管制為佳，本港應避免與共同市場談判破裂，以盡早達成協議。」作為殖民地資本家，他們理解到香港與其宗主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長期以來，他們為了追求利潤，將香港工業生產的發展，完全依從帝國主義的需要，壓低本港勞動工人的工資，生產一些在先進國製造就賺不到錢的產品，使到本港的經濟十分畸形地發展（例如紡織製衣業佔工業生產總值的一半）。這種依賴帝國主義的關係，根本就不容許本港資本家有獨立性，所以工商署長左敦在十一月十二日發出一份聲明中，指共市「要求香港作出犧牲」，又「歧視」香港。而儘管麥里浩在「聯邦作家協會」上概乎其論地批評：「無論是從數量看或其指導思想來看，與過去完全脫節」，而總商會執行董事麥理覺罵「現在的歐洲共同市場，很像已決定扮演一個專橫的紡織羅賓漢。」但他們完全是無能為力的。至於那個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篤修則天真地呼籲「英國政府負起責任」，實際上就更幻想了。赴共市談判的香港貿易處長苗禮善倒願意直接答覆：「英國在此一問題上，不會支持香港。」他們首先要照顧的是英國本身的紡織業，英國即使作為共市貿易部的主席，也改變不了「利」字當頭的現實。港督九月親自出馬到倫敦，也完全無濟於事。

工人階級必須自衛

統治階級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以及好歹也要提出一條出路，免群眾看到暗淡的前景。於是，它一方面提出要加速工業多元化，即主張不要再投資紡織製衣業，另一方面又要現有廠家把紡織品朝向高品質方面發展，好與法、美、日本等國競爭。這二種方法是不會帶來紡織業的好轉的。因為無論工業多元化，或者是發展高價貨，都祇會產生同一現象，就是資本更加集中，和紡織業的繼續走下坡。君不見已經倒閉的製衣廠，都多是小型製衣廠嗎？這是因為要抽調資金，或者轉做高價貨，都非一些小廠所能為。其結果就是一下子甩掉了低價貨的工廠生產線，製造大量失業，並乘勢以失業來減低工資。

這樣，工業頭子的用意就很明顯了。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讓現有的紡織業收縮，讓它萎縮到某一程度。面臨如此重大的威脅和打擊，紡織及製衣工人將會失去任何生活保障。政府宣佈會造成一萬人失業。但實際上肯定會高於此數。一年間從紡織製衣轉入其他行業的，已達三萬多人，足見紡織業衰退。中、小廠就必然會造成更多無法轉業的人口。即使那些暫時仍然開足工的工友，也隨時有可能被壓低貨價、加強勞動強度。例如有些紡織廠，強迫工人一個人看二、三台機。祇有要求廠方保證最低收入，反對隔日開工，才能保障收入。當然資方是不會自動讓步的。相反，他們祇會設陷阱來解僱工人。

製衣業佔了紡織業的一半以上。因而在保障生活的奮鬥中，製衣工人就負擔了更首要的角色。如果製衣業工人節節敗退，整個紡織業就會受到影響。但是由於製衣業一貫施行「件工制」，往往造成工人間有一種競爭心理，而減少了工友的接觸的機會。因此製衣業工人在爭取合理要求之中，必須要慢慢克服這個障礙，把散漫的同行工人漸漸組織起來。沒有這個起碼條件，是談不上奮鬥的。

祇要工人的要求是正義的和合理的，就不怕資本家的打擊，更不怕沒有工人會支持。工人的利益是共通的，步伐一致，就一定會受到大多數工人的贊成。作為代表工人的紡織染工會和製衣工會，亦應及時行動起來，率先領導工人的團結。當資本家藉利潤下降而關廠、減薪、減工時和裁員時，工會和工人都可以提出：依照物價指數制定工資，並且將工時平分給工人而不削減工資。

金禧中學師生續抗爭

「金禧事件發展特刊」

（我們刊登下列的文章，基於對金禧中學師生的支持，雖然並不表示我們對文章內所有意見都同意。文章原刊於十一月四日出版的「金禧事件發展特刊」，乃由中文大學學生會時委會，中大學生報和港大學生會時委會出版。另一份由港大及中大五個團體出版的「金禧事件發展特刊」，亦於十二月中出版了。讀者們若取得該刊，可去函：香港西營盤扶林道香港大學學生會轉時委會收。

金禧中學事件，顯示出在學校內爭取思想、言論和行動自由的重要性。假如校方能夠以政治恐嚇（托派、革馬盟）來打擊同學，是由於它充份明白到可以利用羣眾對政治的恐懼。故此，該項的教訓，不是逃避政治性的問題和害怕政治團體，而是為每一個人，不論其政治、宗教等思想，保衛其合理的權利。（編者）

六月罷課導源

寶血會金禧中學成立約四年餘，是由寶血會梁修女與一群有理想的青年教會工作者不斷運動，為培養出一批能吸收充份的學問、(一)提高品德、(二)關心社會、有勇氣去揭發及指出不義的社會、棟樑而努力耕耘；開辦初期，由於班數很少，加上老師的熱心教學，所以師生相處得融洽。此傳統一直保留至今，雖然教師已增至三十餘人，學生也達千人之眾，但金禧一向給人的印象是既活潑和融而又不能嚴肅認真。

校方涉嫌濫用財力自創校以來便開始，初時老師以為學校創校需款急用，便不以為意；至於後來加入金禧的老師不時從學生週記上知道學校涉嫌濫用財力、書籍而徵收暴利的行為。今年初，兩位老師為了尋求真相，便開始搜集校方的財政資料，發現校方數年來涉嫌濫用財力達廿五萬之鉅，其中包括濫用行政人員薪金、暴力銷售文具書籍和徵收CAPTATION GRANT的誤用等，而所徵之財全數撥歸寶血會戶口。由於事態嚴重，此兩位老師一直秘密進行調查，為免影響金禧同學的學業，便於四月五日下午往見校長梁修女要求解釋，梁承認部份財政資料正確，但以校方需要還債為理由希望兩位老師諒解，兩位老師以財政之舉是整個寶血會行為，不應單由梁修女負責，於是要求進見寶血會會長，不果。兩位老師感覺單憑自己力不可能認清此事真相，遂將掌握的資料公諸全體教師，欲以全體教師之力進一步質詢校董會。四月十四日校董會接晤全體老師，透露梁修女因健康關係已向校董會請辭，而校長一職已由蕭麗芳修女暫代，並宣佈財政事件已請教育司署重核全盤賬目。於是校方便順利地擄取學生、金禧員工的事實轉移到核對賬目問題上，和把責任推卸在梁修女個人身上了。

五月七日，當金禧學生在財政事件上還蒙在鼓裏之際，財政事件受害人——學生家長收到一份署名「一教師」的校方款項資料，當時全家長非常憤怒，要求校方公開解釋，而校方亦立刻作出反應，以教署調查未有結果作理由，拒絕教師、學生和學生家長作任何答覆。由於校方一直對財政的質詢採取緘默和推卸的策略，學生有感非責諸合群之力不辦，遂屢次以班或學生會名義上書代校長蕭修女，要求校方作交代，但蕭修女每次均以不同理由拒絕函件所提的要求。

一直以來，正如天主教大專聯會所言：「老師們是從人的層面去尋求解決。老師們所提出的要求清楚顯示出老師們只關心如何改進學校的教學，罪咎責任的問題尚屬次要。……可是，校方不斷逃避問題進一步打擊一己的威信。」六月三日，教師接獲校方續約聘書附同一「教職員服務約章」，內附十六項條文，包括「教員上課時，不得從事與教學無關工作」及第十四項的「本校教職員如有不遵守上列一至十三項任何一項之規定者，本校校董會有權給與適當之通知，予以解僱。」並且規定應聘人必須簽署此種條文無異對教師職位毫無保障，這是極之不尋常的做法，因為教署規定老師犯錯是先經書面警告而非適當通知便可解僱的。於是教師於六月六日去信校董會要求作字面解釋和修改。六月九日，即簽約限期的前一天，老師得到校董會的答覆是不接納修改服務約章的建議。

學生感覺校方一方面逃避財政責任問題，另一方面却對老師無理迫害，同學為怕大多數教師會自動辭職和為了進一步要求校方對財政責任表態，於是六月九日當天的第三次小息時相繼到操場，向校方提出三項要求：

- (一) 公開交代款項事件之始末。
- (二) 公開保證就款項事件所提出之三項要求。
- (三) 公開解釋就款項事件守則內容。

但蕭校長以「我職責乃維持學校之編制，一切依從校董指示」為理由，堅持學生將要求用書面呈交，由於校方態度惡劣和強硬，於是同學繼續留在操場，而且坐了下來。而老師認為學生此次祇是要求他們應得的東西，故罷課至四時許（當時已非上課時間），有些老師自動坐下表示支持，亦有以半蹲半坐形式表示態度，至下午五時許因時間太晚的關係同學便接受勸諭返家，並草擬三項要求以書面呈交校方。

六月十日，校方仍然採「拖字訣」避而不答，學生乃作二度罷課，重提三項要求，並邀請老師代表公開校方款項始末，老師應承解釋，但要求學生於解釋完畢後，必須回課室上課，而學生表示接納。稍後，蕭校長陪同助理教育司林達達及兩名高級教育官抵達金禧中學，蕭修女欲立刻中止老師代表說話，此時學生代表通過擴音器詢問全體同學要求誰說話，學生表示要老師代表說話，於是老師代表繼續講解財政始末，然後同學亦遵守諾言返回課室上課，罷課至此終止。

由於此次中學罷課乃屬史無前例，教署對之極表關注，部份社會輿論亦意中傷，歪曲製造一個學生受政治唆擺而罷課的形象。而事實上，教師在整個罷課過程中站在被動的位置，甚至同學在罷課之前亦毫無心理準備，可是我們的教育司陶建先生，在沒有半點證據和調查下，於六月十六日親筆致警告信全體教師，謂「近日汝等任教學校所發生的有關學生違抗學校當局事件，本人接獲報告，得悉汝等曾直接或間接介入其中，本人認為事態嚴重。……現向汝等警告，若再獲報告有相同行為，……教育司有權吊銷一位教師的註冊。」教署對教師吊銷註冊的恐嚇和校方十六條服務約章不是用意至明嗎？香港教育就是要製造一群祇會填鴨「內」讀物不會發問的學生，要是你的鸚鵡叫聲學得好，你就得接受迫害，接受恐嚇。

暑假——迫害整頓期

金禧中學經過因財政問題而罷課的事件後，同學和老師因大考在即，亦先以學業為重，靜心等待教署的「調查」報告，而校方也利用大考與暑假這段緩衝時間，在各方面打點整頓，以轉移視線，最顯著是寶血會退出金禧中學，此後金禧改隸屬教育司，以為財政事件便不了了之，並配合七月教署間接放出的空氣謂財政根本沒有問題，而根源於會計算錯誤。

八月一日，政府委派新校長關慧賢代替蕭修女之職，關校長既非寶血會方人仕，亦非修女，當時是聖伯多祿中學校長，自稱有廿多年行政經驗。上任不久，即大量招聘新教職員，據悉其中大部份受聘新職員為關校長之門下學生及親友（如職員關小姐便是校長之姪女），縱非「自己人」，也必對應徵者說：「我請的老師要全為教徒，請你和我合作，如果你能和舊老師相處便相處吧，倘若難於相處，儘管和他們鬧好了，我早晚要他們另謀高就的。」同時增設副校長二人，分由來自培聖聖杜的和伍華姓羅的履任。

往年，上學年未結束時，老師便已知悉新學年任教的班級和擔任的科目，好使老師於暑假有充份時間準備課程，今年却延至九月一日即開課前一天才知悉；與此同時，往年校方於開學後舉辦的教育方針研討營取消了（此營目的商討新學年的教育方針）。八月廿九日舉行的新生家長日也無須老師返校，席上，關校長向新同學說：「我是一家之主，你們能入學全是我決定，你們要飲水思源啊，他們高年級是一個毒瘤，你們不要與舊同學來往，也不必尊敬舊老師。」關校長接着說：「難道他們叫你飲坑渠水你們也飲？如果你們聽我的說話，我會很愛惜你們的。」

綜觀整個暑假以來，金禧校方的部署，著着糾合私黨、擴大一己封建家族式的權力範圍，其對新教職員與新同學的行為如出一轍，在刻意離間老師間和同學間的關係，以遂其開學後迫害和孤立舊老師同學的私意。

新學年制度的變更

校方一切功夫準備就緒後，便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上課後，校方不斷從事制度上的變更，主要有如下幾項：

- (一) 九月一日校方召開會議指定那一位教師教那一班那一科，而往年此等事項是在七月中旬決定的，而今年有些教師分擔到一些以前未接觸過的科目。另外，教育方針的闡釋則由某神父的六個演講所取代。
- (二) 舊老師全任教高年級，只有一兩個負責中一的科目，而中一級則由新老師擔任教席。
- (三) 老師權力削弱了，如缺席事項由教務處管理，貼海報由校長親自簽名批准，學生開班會須三日前通知校方並填具申請書，校方接觸同學不須知會班主任（如校方發通知信給學生時先生絕不知情）、教師接見家長須有校長在場，又忙設級主任以監督教師等。

四往年的土風舞日、朗誦日、戲劇日均取消了，而隸屬於學生會的國樂組、羽毛球組等課外活動，在校方拖延下學生會未能重組，而遲遲不能活動；例如國樂組老師應同學要求便會二次提請校長批准，得到的最後答覆却是國樂組能作為音樂科的課外活動，因此不能有國樂組或國樂會，同時每三個月要舉辦比賽一次。其他如針織班據稱也要明年年初時裝展覽才允許舉辦；總括來說，就只剩下運動日和一年一度的旅行。

(四) 欲增設的校車服務，由於一年級申請人數不足廿人而告吹，而校方一直沒有詢問二年級以上的情况。

(五) 聞說校方藉新職工之助時常巡迴偷聽老師和同學的談話，至於開會錄音、背後記名、映相等，更是四年來所沒有的。

(六) 往年週會屬全校性質，現改為二組，分中一至中三一組和中三至中五一組，於不同時間舉行。

(七) 學生今後須攜帶學生證返校，以便隨時查閱，缺帶者需受處分；據校方解釋是防止外人冒充學生。

(八) 以往學生訂閱華僑日報和文匯報的設施取消了，此兩份報章為往年經濟及公共事務的課外讀物。

以上數項制度的變更，有的針對舊老師，有的針對舊同學，而然，這種種變更不正與關校長開學禮說的「希望讓過去的算了，重新開始，我們應處事客觀，勿感情用事」的良言美意背道而馳嗎？

新舊教職員分析

如果一定要把新聘的教職員形象化的話，那麼某老師那句「我來金禧不是為教育而是為改造學生」最能具體落實他們的形象了。現在讓我們看看新聘教職員怎樣去「改造」金禧同學吧，以下是兩個典型例子。

(一) 一位新老師得意洋洋的「改造」同學時說：「學校好比一所百貨公司，先生祇不過是售貨員，學生則是顧客，新老師上任後如舊僱員忍受不了新老師的作風，大可有骨氣地離去。」

(二) 一位新老師在初開學時對學生開宗明義表示有甚麼事都別麻煩她，所以對學生施以「倘有同學借東西不還，就學精一些，以後不要再借給她算了，這些小事不要來找我」的教化。

新老師的「改造」高論，相信很難在任一木教育理論和聖經中找到，至於金禧新聘的實驗室助理，更覺令人「刮目相看」，他對實驗一無所知，益且態度較市井之徒猶差，你想想想不到「衰嘢，整日係度詐型」等語會出自他的口來詛罵學生的，這位實驗室助理還愛到處攝取學生談話和集會的鏡頭，據傳有

一次還在鄰校開平中學以長鏡攝取學生放學後活動的情況。

那麼，新教職員既是如斯，不是每個舊老師都關心同學，都想提高同學品德，都想教導同學揭發及指出不義之事嗎？

是，遠在財政事件時有些舊老師就為了自己的「前途」和升職，自私自利的拋棄同學的利益，背棄創校的宗旨，故此，這些「老師」都不配作為同學的舊老師，這裏所說的舊老師，就是堅持創校時梁修女與這群創校者所設定的宗旨。

大體上，新舊老師和職工都處於格格不入的情況，新老師準時返校和準時放學，很少關心同學的活動，甚至舊同學主動邀請新老師打球、遊戲時亦遭拒絕，有些新老師還對學生的見面招呼以不禮貌回報。至於舊老師則仍依往年慣例，放學後留校教學生功課，與學生們打球、談話等，故此給學生的印象是先生亦是朋友。

粥舖事件

九月十六日，一位中一同學在學校附近一間粥舖吃粥時不慎燙傷，手部隆起了兩個大水泡，關校長便在午間訓話時說：「你們高年級不懂救傷便不要亂施救，今早一位大姐姐便弄破了一個水泡。」並指救傷的大姐姐處理不當，有意加害一年級同學，遂規定以後校內祇有三位具救傷證書的老師有資格施救。事後，當事人說出真相，原來施救者乃粥舖少東，而「救傷」的中二姊姊則祇替同學抹去裙上的粥而已。校長不根查事實，肆意歪曲公佈於全體同學，難道是師者之範嗎？

潘××老師辭職事件

潘××老師於金禧創校時便開始任教，去年離職往英國受訓，其間得悉金禧同學會舉行罷課，今年回校繼續職時，便與新校長詳談，覺得金禧同學的行為未免太過份，應允與校長合作，潘老師當時的想法是不相信一個教徒對人是完全沒有愛心的，於是與新老師一樣對舊同學投以偏見仇視的態度，並着強調學生應以學業為重。

潘老師過去給高年級同學的印象是很愛學生和重感情的，今年擔任五仁班主任後，一反常態，開學後便諸多挑剔，整天無故罵學生和採取不合作態度，故此個多月來五仁班的學習情緒都很差。

但開課個多月後，校方的種種措施和行為，使她不得不評估自己過去的想法，歷史的見證使她改變心中不疑的道理，最令她傷心的，是看見一個教徒，整天講愛心却做出這些卑劣的行為，更歎息所謂教育界竟如是黑暗，覺得做下去也沒有意義，於是私下於十月十一日以「身體不適」為名提請辭職，及至當天晚上，潘老師深思發覺辭職是逃避現實，認為同學現在正需要老師的支持，於是致電校長，請求撤回辭職信不呈上校董會，翌日更滿懷信心的回校授課，誰知中午時份，校長告訴潘老師校董會已開會接受她的辭職，並囑潘老師回家等掛號信。潘老師知道事至此，並不氣餒，下午作臨別授課時對同學說了很多話，當時同學還不知潘老師已「辭職」。

潘老師萬萬想不到校董會可遲遲不開以拖延學生會的重新成立，却可以立刻召開以辭職校方認為沒有利用價值的老師，辭職既已人為地變成事實，於是當晚（十二日）致電給一老師，囑其向各老師和同學交待自己的辭職，當金禧同學聽聞潘老師辭職，便全班放聲大哭上來；翌日，潘老師為怕同學因此而軟弱下去，遂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學，以示鼓勵，該信全文如下：

各位同學：
我走了，唯一感覺抱歉的還是你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對你們來說也許有用，目前金禧的環境，在在都可以武裝起你們的意志和精神，又對於所謂骨氣的閉言，

你們可以不理。金禧四年落得如此光景，是任何愛護學校的人所痛心的，還望你們以堅強的意志去迎戰一切。
敬祝
錦繡前程
潘 上
13-10-77

一智事件

十月十三日一個消息，二智班為了商討與鄰班約戰排球而徵求同學意見，當時杜副校長經過，得悉二智班同學，又沒有負責老師在場，便大為緊張，聲色俱厲地把學生趕出來，同時鎖上課室門，舊校工和二智的同學都急得哭起來，於是同學向校方為何鎖門，但當時情況是小事而非上課，嘈的理由實難以令人信服，於是再問，得到的答覆是「有人失竊」，同學便又問全班同學有誰失竊，却找不到有人投訴失竊，校方見亂加理由不是辦法，於是索性說二智班同學沒有申請，但當時的情況又不像開會，校方又轉向矛頭罵負責管理的舊校工處理不當。

校方對同學商議一些事件也如此緊張，無非欲挑引事端，造成新舊師生同學互相仇視，校方對中二級的年級學生也不放過，實在令人齒冷。

中四仁事件

十月十四日，四仁班上完第七節的體育課後，原本接着第八節是英文課，但因英文老師缺席而改由一老師代課，此老師曾於當日在二仁班厲聲地詛咒舊老師、同學及他們的父母「教導」她們去仇視人，致使她們變成這個樣子，二仁班哭了整個上午，四仁班同學知道這老師代課可能再挑引事端，才上完體育課便立刻返回課室，却發覺四仁班中間一行的書簿和書包被人查翻，便向此老師質詢，此老師前言不對後語，於是四仁班與該老師討論此事，待放學後仍未有結果，同樓的其他班也全放棄了，看見四仁班關上課室門和老師爭論着，便圍攔在四仁課室外看過去究竟，甚至通知關心同學的老師上來解圍，及至五時，關校長上來課室，首先對站在課室門口的老師說：「請無關的老師下去（編者按：何謂無關）。」於是懷着關心之情的老師忍氣吞聲地轉身下教員室，却聽見背後傳來校長之聲說：「倘若四仁發生甚麼事變和困難，我才請你們上來幫手鎮壓。」此時老師反而停下了步，轉過身來要求校長解釋何謂鎮壓，關校長納罕了一會，補充說：「我祇是用錯字。」及至再再問下去，關校長氣急敗壞的說：「我沒有說過鎮壓，是你們聽錯罷了。」有些老師不待關校長說完便憤憤地說：「你說的話不承認，又如何能教學生！」校長和老師頓成僵局，關校長見情勢比人強，慌張的說要下去召警，老師們聽見要召警，便都下教員室等待，其中一個學生看見此情形，激動得拍胸大哭叫：「關校長其身不正，如何教我們！」當時四仁班的同學都很激動，氣氛一度緊張。待至六時仍未有警方人員來，同學才返家。

事隔幾天，有關老師曾詢問校方四仁班被翻書簿書包的事調查進行怎樣，校方稱調查沒有結果。據四仁班對面班的同學稱，見四仁同學未上課時，代課老師和另一老師曾在四仁課室內勾留好一段時間。至於同學何以被翻書包的動機則至今未明。

中一仁事件

十月二十日，中一仁剛上完體育課，返回課室後發現有些書有被翻過的跡象，其中一個同學更失去二十元，於是勞動級主任和校長上來調查，校長先問誰不見二十元，於是勞動級主任說：「誰失去錢便寫我失去多少錢並簽名。」學生聽後便寫好交給校長，關校長接了紙，便對失錢的同學說：「你是否真的不見二十元？想清楚是否寫在紙上？你需知道，如果沒有失錢而說不見便是屬於誣告，誣告屬於刑事案。」說完這些恐嚇的說話後便轉向全班說：「你們要是誰再說書包被翻過，我便會調查至下午二時，你們也不想其他同學沒飯吃罷。」隨即把失錢的那一紙張交回給學生，並令學生重新填寫，結果學生重新寫上「我沒有失

去二十元」，其他書本給翻過的同學則寫「我不追究」校長看後，滿意地說：「你們真聽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錫晒你們啊。」同時班主任也附和着：「你那二十元回家找不到，也不可追究的。」

依往年金禧處理失竊的慣例是誓必查過水落石出不能休的，且把調查的過程作為對學生的教育，故此高年級同學很少出現偷竊的行為。校長對此次中一仁失竊事件未免過於馬虎了事之嫌，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教育政策也可說是一時瑜亮。

楊修女脫離寶血會事件

楊修女已任教金禧達數年之久，也隸屬於寶血會方，六月財政事件和罷課時，楊一查以為會方的造法是對的，認為財政事件交會方和教署處理，同學應耐心等待和對會方給予信任，故此對罷課的同學和支持的老師極表不滿。

金禧事件發展至今，眼前一件一件鐵錘錘事實使她驚覺校方行為的無恥。而寶血會一直以來不對下層修女交代財政事件的情形，與及如她所想財政報告將有戲劇化的結果，她終於無顧當前的惡勢力，走上了永生的抉擇，毅然脫離會方，以信仰與生活合一，跳出了制度化的統治。

新財政問題——家政科事件

十月七日，家政科老師發覺購買家政用品的「張單據副本」日期，於是到會計賬房請求會計郭小姐翻查原單據日期，偶然發現家政科單據被塗改，如1字改2字，3字改8字等，查核下，總額和細項之和亦有出入，於是問會計小姐為何改單據？而會計小姐亦不知何人所改，於是兩家同意下，用紅筆劃去塗改過的數目而重新填上正確的數目。

當日下午家政科老師與其他老師談起這件事，大家覺得事有蹊蹺，於是與關校長接觸，但毫無結果，後來校方及會計分別在會計賬房貼兩條封條，嚴禁任何人進入。

接着星期一教署和金禧核數師共四人由校長等陪同下前來調查，教署人員質詢郭小姐和家政科老師為何把塗改過的數目更正過來，却沒有調查究竟誰人始作俑者塗改單據的數目。

據所知，家政科支出的款項，再向教育司署填報申請時，填報表上的數目較實際支出的數字為多，但超過的數額很少，所多的錢是撥入校方的戶口而不會經過郭小姐之手，那麼究竟誰塗改數額呢？

如果我們把家政課事件連接到十月六日星報報載政府金禧財

政事件調查報告，可能會看出有一點端倪。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十月六日稱：警方已找到該公款違法事件之有關證據（祇一人涉嫌在內，並非屬集團性違法事件），（二）牽涉到的款項數目僅數千元左右。

既非集團性款項，寶血會數年營私舞弊榨取學生錢財不是可以逍遙法外嗎？違法祇一人涉嫌在內，則政府想加害誰呢？至於第二項說的项目僅為數千元，則那聚斂了的廿多萬元進了誰的戶口？

以上政府和校方種種隱藏着的陰謀，並非政府公佈純為「公款誤用」所概括的。

結語

最近，某方面製造了很多輿論，把熱心的老師扣上「托派」、「革馬盟」的帽子，配合財政祇一人涉嫌事來嫁害老師同學藉機「攪政治」，加上校方糾集合眾處處迫害正義的舊老師和舊同學，採取分層一年級和高年級的政策，在在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由十月新財政問題開始，外界便對金禧舊師生採取種種輿論攻擊，除了強扣政治帽子外，更渲染為「鬥爭學校」、「炮打司令部」。校內則到處錄音、映相、背後記名、偷聽教師和學生說話，又肆意挑起是非，例如中五未開課會便見檢查警鐘，在在激使學生沉不住氣再靜坐罷課時，便可以堂而皇之根據陶警警告信吊銷老師的教師註冊。

在政府而言，無論同學出發點是如何正確，罷課是絕對不容許存在的行為；在教會而言，營私舞弊是有損教會聲譽的問題，兩者均有其共同志趣，就是絕不可能有罷課事件發生，這一點充份為某教會和政府加害老師同學的原因。

新老師和新同學在個多月來被校方用作迫害正義的舊師生的武器，可喜的是，一些新同學已了解大姐姐的處境，也漸漸與她們建立起友誼來，這足以成爲其他新老師和新同學的典範，新老師應該拋開校方給你迂腐的有色眼鏡，認清校方背後離間挑撥的陰謀，團結起來向不義之事挑戰。

我們相信，金禧同學的行動是光明和正義的，金禧的事情不單是金禧師生的事，金禧的事情是整個教育界、整個傳播界的事情；金禧的事情，是你和我要關心的事情。

報導完金禧事件的始末，再看文首的幾條問題，才驚覺問題之大和問題裏有隱藏着不少問題，有些是你和我都不能解答的。

讀者們：你是木屋區或安置區的居民嗎？你嗜被因嗎？你嗜試嗎？你嗜過嗎？你嗜苦嗎？你嗜憂嗎？你嗜慮嗎？你嗜上嗎？你嗜面嗎？你嗜正嗎？你嗜是嗎？你嗜否嗎？你嗜希望嗎？你嗜與嗎？你嗜分享嗎？你嗜勝利嗎？

我們，新思潮的主辦者，之所以要辦這份刊物，並不是作為公開論壇而已，亦不是高調地與一班他理置入社會，以致整個世界。如想和我們保持經常簡便可最好的方法加入通訊員行列，手續非常簡單，只需填妥下列表格，寄給本刊社便得。

姓名：_____
性別：_____
學校/職業：_____
地址：_____
年齡：_____
電話：_____
程度：_____
 希望多參加支持亞洲仔居民的工作
 希望多了解「新思潮」（包括它的宗旨、立場、活動及其他）
 有興趣參加採訪工作
 投稿
(請以√填上適合你的空格)

爭取民主

台灣羣眾暴動

葉史驪

正當台灣國民黨統治集團利用有限的「地方選舉」來宣揚其實行的「民主」和「地方自治」之際，台灣羣眾在過萬名羣眾，以示示威和暴動來揭穿這些「選舉」的虛偽和黑暗。

十一月十九日，時值「地方選舉」的五種席位（縣市長、鄉鎮市長、市議員、縣議員和省議員）在台中進行，在距離台北西南二十五里，有廿五萬人口的中壢市，約有一萬名市民於下午因不滿一名監選官員的舞弊行徑，於傍晚後襲擊當地的警察局和放火焚燒車輛。

一些西方通訊社指出，這次羣眾暴動，是台灣廿一年來的第一次。在一九五七年，一名駐台美軍在草山（今稱陽明山）槍殺了一名國民黨官員劉自然，但被判無罪，而且還以專機「光榮地」送回美國。當宣判無罪的消息於五月廿四日當天傳出後，台北市的三萬名羣眾就即集結，襲擊了美駐台領事館及新聞處。當時羣眾的反美帝國主義情緒十分高漲，曾高喊「美軍立即滾出去」的口號。

中壢的示威和暴動，近年有不少預演。近年來，台灣羣眾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亦曾多次演變成以行動來反抗。雖然經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檢查和封鎖，幾次較大的事件仍然被傳聞開來。七五年初，亦是在中壢市，由於國民黨政權要在該市擴建一個工業區，給以外資發展之用，要強拆佔地約三百多公頃地的八百多戶居民；當強拆執行時，該區的數千名居民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拿起鋤頭鐵錘等武器，將五名駐守現場的警察打傷。同年十二月，當台灣進行所謂「增額補選立法委員選舉」時，台北市的三萬多居民和宜蘭縣一萬名居民，亦因不滿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舞弊而舉行了示威，包圍起當地的警察局和選務所。國民黨出動了憲兵和警察，在兩地拘捕了百多人，並在台北宣佈了戒嚴令。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窺見，近年來台灣羣眾對蔣獨裁統治的不滿，已越來越敢於以實際的行動反抗。雖然今次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壢市的選舉舞弊，但從整件事來看，可以發覺到羣眾不滿的廣泛程度。

一名「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曾經目睹當晚暴動的經過。據他報導說：

「那天上午，這個身為中壢小學校長的選舉官員范新林被指責塗改選票，而被送往警局，但立即即被釋放。同日下午，范再次被在場的羣眾責為舞弊時，他們就不那樣寬大了。」

「羣眾在警局對面的投票站抓住他，要求把他逮捕。可是警察推推搡搡，說只有選舉局有權處理。於是，當晚就發生了超過一萬人的暴動，貨車被推倒，消防局和警局被縱火焚燒。當警察封鎖了警局之後，數千計新來參加的示威者在橫街轉來轉去。被推翻的憲兵吉普車散佈在五幢樓宇以外，在那裏未能進入主要暴動現場的示威者，製造了自己的小型暴動。」

看來，當時軍警並不想與羣眾作正面對抗。報導說：「……零星的催淚彈並未驅散羣眾，在消防局內，記者看到防暴隊在樓上的三個出口靜靜地撤出。事後知道，他們是奉令撤離現場以避免直接的對抗。」

但長期受到國民黨「軍法」統治下的羣眾，對軍警則採取仇恨的態度。「看來，羣眾的怨恨是直接針對對象徵警察和軍隊的東西。在與主要暴動地點隔開不遠的火車站，一群青年搗毀了歐憲瑜（國民黨的桃園縣長候選人）的競選廣告。歐憲瑜的父親是一名警察，而他自己則曾在相當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台灣調查局中工作了九年。」

由於軍警避開了羣眾怒火的鋒芒，據報只有極少人受傷，而除了那個舞弊的范新林外，仍未聞有人當場被捕。

另一方面，「地方選舉」的結果，亦可反映出羣眾對國民黨的不滿。在過去的選舉裏，國民黨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從出錢拉票、改選票、塗污選票、開票時突然停電到出特務恐嚇選民，目的都是要維持國民黨人的當選。今次選舉選特多花樣出籠；例如那個被指為貪污的高雄市長王玉雲，在競選連任時，竟出到在神廟前斬雞發誓，連同家人跪地痛哭流涕的鬧劇。這種腐化的官僚政治，正與台灣人民要求民主的願望相違。所以選舉結果是國民黨受到重大的挫折。在省議員七十七個席位中，國民黨又失去了二十個，使其中三十九人（半數以上）是非國民黨人。而在兩個重要城市中，中壢和台南的市長選舉，和兩個工業區嘉義縣和桃園縣的縣長選舉中，國民黨都失敗。其中桃園縣更為突出，當選縣長的許良信，原為國民黨人，但受壓力其退出選舉，結果許良信忿而退出國民黨，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而對手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却是受人忿恨的對象，結果許良信以九萬票壓倒性取得縣長職位。

到暴動事件稍為平定，國民黨就開始動員他的言論機器，對參與中壢市暴動的羣眾，進行「打擊」。例如，十一月廿一日的「聯合報」說：「那些別有用心心的暴亂份子，趁機煽動羣眾，蓄意為難維護地方安寧的警察，目無法紀……希望司法檢察單位秉公處理，千萬別使野心份子逍遙法外。」

這顯然是為鎮壓羣眾製造輿論。據知國民黨政權已下令「刑事警察局」追查暴動事件的經過情況。十二月初時，有消息說蔣正追迫捕三人「台獨份子」，企圖將羣眾的正義行動，打成「台獨的陰謀」。雖然至今為止，還未知有人被捕的消息。但十二月中有報章報導，國民黨已下令通緝六十餘名曾參加中壢暴動的份子，其中有不少大學生。我們必須對此密切注意。

國民黨面對日益困難的局面，顯然有點手足無措。又面臨十二月底舉行的「省議會正副議長」的選舉日益迫近，在省議員中既有半數以上不是國民黨人，使到蔣將擔心會失去了這兩個重要的職位。為此，蔣經國在十一月廿三日召開了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檢討」形勢。據「聯合報」報導說：「由於這次選舉，執政黨中央委員會及省市黨部連日就就輔選得失詳加檢討，昨天中常會的檢討則是最重要的一次。」檢討的結果，據說將會有「革新措施」。其中之一，據聞是國民黨已決定追查關於現任中壢市長王玉雲的貪污行為。看來，王玉雲可能會成爲國民黨平息民忿的代罪羔羊。

那些力量威脅着國民黨獨裁的統治呢？那些支持非國民黨候選人的羣眾的行爲，正面回答了這些問題。羣眾十分重視選舉，視它爲對抗國民黨的一種方法。「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會經描述道：「……那天的好天氣引來了創紀錄的羣眾，他們不但投票，而且作爲志願的監票員，在投票站靜靜地等候。有些人還帶來手電筒以防電力「意外地」中斷。」

支持非國民黨人的力量甚至採取街頭打鬥的方式，來對付國民黨；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報導說：「……當晚，許良信的支持者的行列與歐憲瑜的擁護者在街上相遇。地方報紙說，許良信的支持者擊歐的總部，但許的支持者堅稱他們的對手首先擲石塊。據說，許多人要縫合傷口，而許本人則差一點就被石塊打中。」

在羣眾之中，青年人佔很大的比例，「聯合報」藉着所謂「讀者來信」，指出參與搗毀警局的人群很多都是十八、十九歲的大中學生，有中壢的學生，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和台大夜間部的學生。連十一月廿日的中國時報也不得不認爲：「中壢事件的主要肇事者，是一些衝動的青少年。這些滋事的青少年可能感情用事，可能是因爲他們在個人生活中是受挫的一群。他們在選舉中鬧事，可能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個性往往受到最徹底的貶抑，大多數青少年都會因性向與興趣不合而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社會便充滿了「落空的年輕人」受挫的年輕人太多，總不是社會之福，因爲他們對社會安定可能構成某種程度的威脅。」

國民黨當然明白青年不滿的社會根源，但是它恐懼的是這些「落空的年輕人」對它統治所「構成的某種程度的威脅」，故此它絲毫不考慮自己獨裁統治所引起惡果，不結束廿多年的「軍法統治」和「戒嚴時期」，不給予台灣居民真正的民主，讓他們通過一次普選全權的台灣人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台灣人民所選擇的政府，反而欲加強政治鎮壓的恐怖活動。

目前，據十一月廿三日聯合報報導，蔣經國聽了「內政部長」張豐緒對「台灣五項地區選舉」的報告後，即下令法治必須人人維護，不得破壞。而「內政部長」先生轉而面令「警政署長」孔令晟，「詳實調查後，依法公正處理」。

我們必須反對蔣經國政權鎮壓台灣人民民主權利的任何措施，應該要求結束國民黨不民主的獨裁統治、釋放所有政治犯和恢復他們的權利，讓台灣人民實行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

而政府對教育司署的做法，至今仍是沉默，實際上是否容許了陶建和林達塗的做法，教協會雖然一再表示，但當局公佈的態度和希望教務署放開執迷不悟的專橫態度，至少拖至明年三月才企圖將事件拖延，以期爭取時間，到時經已過期，自然是不容易被欺騙的，若政府不承認教師的基本利益和權利爲依歸，教師群起而攻之，會得到市民羣眾所支持的。

況且，由於官小縮班而蒙受打擊官小教師也同樣面對失業的威脅，因此，資小教師與官小教師，教協會與官非會若能共同合作，就有可能團結起廣大小學教師，形成巨大的力量，取得羣眾的支持和爭取它的權益，使政府不得不承認它的責任。

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最近所透露，本學年度的小學畢業生會有十萬四千餘人，而在明年九月新學期入學的一年級生，却只有七萬餘人；即是說，本年度全港就讀於官、津、補、私的小學生，以目前官校尚未受減少三萬四千多人；而這些減少，估計將主要影響到受政府資助（津貼及補助）的小學。這種嚴重的就業危機，可預見到明年，資助小學的教師，會遇到嚴重的就業危機。

不過，助理教育司（教育）林達塗即斷言地否認這一點。他在十月八日會見「教師會」的代表時，仍口口聲聲說「根據人口統計數字，全港在校學生人數，本年三月較七一年九月尚多三千人，目前官小和小學生較前減少是事實，然若謂津小教師將面臨與官小教師同一遭遇，明智者可斷言爲絕不可能。」

同一天的另一個場合，林達塗亦與教協會的代表們舉行了會談，討論未來三年津小教師縮班問題的解決辦法。他接受電視台訪問關於是次會議時，同樣肯定地說：「……雖然對未來三年內資助小學縮班情況暫未能估計，但教務深信在未來三年內，由於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包括中學教育、特殊教育、輔導工作），可以肯定有關的縮班超額教師將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繼續工作。」

林達塗的這個保證，確實令到津小教師們透了一口大氣，以爲政府還不致於拋棄過去三年來對津小教師就業保障的承諾，不會採取對付官小教師「強迫退休」般的手段。

然而，正當林達塗一面作公開保證時，教育司却一面決定拋棄它的承諾。緊隨着教協會依過去慣例將八日的會談記錄送交教務署存檔備忘之後，十一月十日，林達塗就提出官方改變了立場。他指出教務署於明年三月初，就會宣佈有關明年九月起新學年內港九各地學校新設立的班級和因學生不足而取消的班級數目，到時才可估計受影響的資助教師的人數；到五月中，教務署會重新展開職業輔導組的工作，他一面仍說：「超額教師會因新班開設，教師退休、離職等而獲教席。」但另一面隨即立即補充道：「……雖然職業輔導組定會盡其最大之努力，爲資助小學超額教師安排教席，但此職業輔導組並不能保證彼等必獲得教席。」

再到十七日，教務正式以函件告訴教協會稱：「……教務代表林達塗，並無肯定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以供資助小學超額教師調職工作，亦無肯定彼等因而失業……『基於種種因素，教務不能保證所有超額教師必能獲得職位。』」

教務在短短十天內前後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顯然是政府背信食言，出爾反爾，故此津補教師其爲忿懣。雖然如此，教協會還是認真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於十月廿日致函教務署，要求在最短期內再舉行的會談。

林達塗前後反覆的態度，其矛盾處十分明顯：既然「可以肯定有關的縮班教師將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爲甚麼又「不能保證所有超額教師必能獲得職位」呢？

不過他並打算去回答這個問題，殖民地獨裁的政制給予他方便之門，他在十一月一日回覆教協的信中，祇是簡單地宣佈並無與教協會再舉行會談之必要。

橫蠻無理的立場，官僚獨裁的態度，遂進一步引起廣大教師和教協會的憤慨。十一月六日，教協致函市政司羅弼時，強烈地指出林達塗對閉關談判之門，乃是一種「極爲專橫惡劣的態度」，必須立即改變；而此種態度，乃是「企圖藉此把（政府）單方面的意見，強加諸對方（教師），迫使其接受。」

教協會聲明，林達塗的「惡劣態度，正造成嚴重的事態；倘不立即改變，則一九七三年文憑教師罷課的歷史事件，必將會重演。」

文憑教師罷課事件，雖然起因是教師們爲爭取合理薪酬而開展，但引發罷課的動力，確實與殖民地的官僚政制有一定的關係。七六年五月發表的「安子介報告書」亦坦承承認：「……誠然，教師們的不滿情緒和怨懣，當時已十分普遍，但是，如果有適當的商討和談判的途徑，而又能充份加以利用，則這次事件不必發展到如此不愉快和難以收拾的局面，以致產生廣泛的惡感並全面的破裂。」

言尤在耳，政府却故態復萌，究其原因，除了殖民地官僚的一貫作風在作祟外，顯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府並不打算解決因過去無計劃的師資政策而造成的超額教師問題；基於統治階級的其它方面利益，政府拒絕維持「超額」的教師，從而不要讓小學教育有更多人

7 保障津小教師就業權利

夏丁凌

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最近所透露，本學年度的小學畢業生會有十萬四千餘人，而在明年九月新學期入學的一年級生，却只有七萬餘人；即是說，本年度全港就讀於官、津、補、私的小學生，以目前官校尚未受減少三萬四千多人；而這些減少，估計將主要影響到受政府資助（津貼及補助）的小學。這種嚴重的就業危機，可預見到明年，資助小學的教師，會遇到嚴重的就業危機。

不過，助理教育司（教育）林達塗即斷言地否認這一點。他在十月八日會見「教師會」的代表時，仍口口聲聲說「根據人口統計數字，全港在校學生人數，本年三月較七一年九月尚多三千人，目前官小和小學生較前減少是事實，然若謂津小教師將面臨與官小教師同一遭遇，明智者可斷言爲絕不可能。」

同一天的另一個場合，林達塗亦與教協會的代表們舉行了會談，討論未來三年津小教師縮班問題的解決辦法。他接受電視台訪問關於是次會議時，同樣肯定地說：「……雖然對未來三年內資助小學縮班情況暫未能估計，但教務深信在未來三年內，由於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包括中學教育、特殊教育、輔導工作），可以肯定有關的縮班超額教師將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繼續工作。」

林達塗的這個保證，確實令到津小教師們透了一口大氣，以爲政府還不致於拋棄過去三年來對津小教師就業保障的承諾，不會採取對付官小教師「強迫退休」般的手段。

然而，正當林達塗一面作公開保證時，教育司却一面決定拋棄它的承諾。緊隨着教協會依過去慣例將八日的會談記錄送交教務署存檔備忘之後，十一月十日，林達塗就提出官方改變了立場。他指出教務署於明年三月初，就會宣佈有關明年九月起新學年內港九各地學校新設立的班級和因學生不足而取消的班級數目，到時才可估計受影響的資助教師的人數；到五月中，教務署會重新展開職業輔導組的工作，他一面仍說：「超額教師會因新班開設，教師退休、離職等而獲教席。」但另一面隨即立即補充道：「……雖然職業輔導組定會盡其最大之努力，爲資助小學超額教師安排教席，但此職業輔導組並不能保證彼等必獲得教席。」

再到十七日，教務正式以函件告訴教協會稱：「……教務代表林達塗，並無肯定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以供資助小學超額教師調職工作，亦無肯定彼等因而失業……『基於種種因素，教務不能保證所有超額教師必能獲得職位。』」

教務在短短十天內前後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顯然是政府背信食言，出爾反爾，故此津補教師其爲忿懣。雖然如此，教協會還是認真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於十月廿日致函教務署，要求在最短期內再舉行的會談。

林達塗前後反覆的態度，其矛盾處十分明顯：既然「可以肯定有關的縮班教師將有足夠的教育工作崗位」，爲甚麼又「不能保證所有超額教師必能獲得職位」呢？

不過他並打算去回答這個問題，殖民地獨裁的政制給予他方便之門，他在十一月一日回覆教協的信中，祇是簡單地宣佈並無與教協會再舉行會談之必要。

橫蠻無理的立場，官僚獨裁的態度，遂進一步引起廣大教師和教協會的憤慨。十一月六日，教協致函市政司羅弼時，強烈地指出林達塗對閉關談判之門，乃是一種「極爲專橫惡劣的態度」，必須立即改變；而此種態度，乃是「企圖藉此把（政府）單方面的意見，強加諸對方（教師），迫使其接受。」

教協會聲明，林達塗的「惡劣態度，正造成嚴重的事態；倘不立即改變，則一九七三年文憑教師罷課的歷史事件，必將會重演。」

文憑教師罷課事件，雖然起因是教師們爲爭取合理薪酬而開展，但引發罷課的動力，確實與殖民地的官僚政制有一定的關係。七六年五月發表的「安子介報告書」亦坦承承認：「……誠然，教師們的不滿情緒和怨懣，當時已十分普遍，但是，如果有適當的商討和談判的途徑，而又能充份加以利用，則這次事件不必發展到如此不愉快和難以收拾的局面，以致產生廣泛的惡感並全面的破裂。」

言尤在耳，政府却故態復萌，究其原因，除了殖民地官僚的一貫作風在作祟外，顯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府並不打算解決因過去無計劃的師資政策而造成的超額教師問題；基於統治階級的其它方面利益，政府拒絕維持「超額」的教師，從而不要讓小學教育有更多人

揭開關於以色列的神話

何虹



圖：以色列軍隊進攻一個巴勒斯坦村後做成的難民。

歐美各國和以色列的當政者一直都把中東戰爭危機的責任推在阿拉伯國家身上，宣傳以色列是猶太人長久慘被歧視後，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但阿拉伯各國却要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權利，要把這二百萬可憐的猶太人趕上絕路。

把猶太人過去和今天的被歧視，與以色列的存在連結起來是一種詭辯；因為要清除對猶太人的歧視是要爭取平等權利，但以色列則是一副進行對阿拉伯人歧視的帝國之國家機器。

以色列國的誕生

猶太復國主義原是猶太人中非常細小的流派。第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在完全得不到外界援手的情況下，被納粹大量屠殺，因而不滿猶太人在對各國政府失望之餘，開始傾向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巴勒斯坦。

但要建立一個全是猶太人的國家，還要把當地的阿拉伯人驅逐或剝奪他們的民主權利，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必須借助歐美帝國主義的力量，朋比為奸。

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把巴勒斯坦分為阿拉伯國和猶太國，儘管這項決定為阿拉伯人所反對，當時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佔多數，在猶太國的範圍內也佔人口一半（五十萬），並擁有四分之三的可耕地。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歐美各國的政治和物質支持下，一方面排斥當地的阿拉伯人，進行建立其國家機構，另一方面則對阿拉伯人製造恐怖。一九四八年四月發生了一宗令人毛骨聳然的屠殺事件，阿拉伯人村落 DEIR Y-ASSIN 由於拒絕外國阿拉伯軍隊在當地設立據點，而受到鄰近猶太人的贊許，但却受到猶太地下恐怖主義組織 IRGUN 攻擊。這還是在當地軍隊同意下行的。結果有二百五十人被殺，其中一百五十具屍體被掉下井裏。餘生者被押到耶路撒冷遊行^①。這宗淒厲的屠殺事件震驚了當地的阿拉伯人，既然與猶太人有關係的村落也會被屠殺，其他就更不言而喻，阿拉伯人的逃亡潮就此掀起了。

英國著名猶太復國主義者金芝（JOH KIMCHE）的著作「中末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也要承認這種恐怖：「IRGUN 洗劫阿拉伯家園和商店的行為很快就被解釋過去。來自 JAFFA 歷時四月的攻擊，使不少猶太人失去家園及其一切。為了提供他們的需要，其後成了這種行為的辯護。HAGANAH 和 PALMACH 這兩處的兵士不久就加入了這些大規模的洗劫和放肆的破壞，使猶太人的軍事勝利蒙上了一層黑幕，這種行為可能是自然的，但却是可憎的。這應該在一開始便堅決制止，但這種行為很快便有了物質的吸引、和辯護的藉口。」

一九四八年戰爭結束後，以色列的種族歧視制度也確立下來。稱之為制度是因為種族歧視行為的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一個猶太人希望與阿拉伯人平等共處也是不可能的事。而掠奪猶太人的土地的事件，也有了一個合法的名字：「歸還土地」。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以色列人權民權同盟的主席，以色列·薩克教授（附註一）在一篇訪問記中，對以色列的種族歧視制

度作出了扼要的介紹^②。他說：「以色列事實上像南非那樣，存在種族隔離。…」

「例如，以色列統計處發表的一九七四年官方統計數字，出生，死亡數字等，你會看到以色列是沒有以色列人的，只有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如果你到任何一處新舊城共存的地方，如 NA-ZARETH 你會發覺舊城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任何人都可以來往，買賣，簽約租屋。但在新城，或稱上城，租樓則要證明是猶太人才可以。」這根據種族主義的定義，這就是要證明承租人的母親，或祖母，或曾祖母是猶太人。這些地區是猶太國家基金所興建或管理的。如果業主被發現租地方給非猶太人則會受到重罰。

「一個百分之九十的住宅區都需要這種手續的社會，除了名做隔離社會外，就沒有其他名字了。約翰尼斯堡也需要相似的證明，唯一的差異是人們知道約翰尼斯堡，而不知道 NAZARETH。

「其他方面也是這樣。例如現在以色列有一個稱為加尼里猶太化的官方計劃。這就是說政府認為加尼里有太多阿拉伯人，因而決定正式和公開地無償沒收他們一些土地，轉讓給猶太人，只准猶太人居住……」

在談及中小學教育方面，薩克教授指出「在以色列有兩個完全分離的學校制度，希伯來語的和阿拉伯語的，在物質條件方面，阿拉伯學校系統受到嚴重的歧視，沒有獨立樓宇，或只有很差的，大多數缺乏實驗室，只有低水準的教師和助教。

「最嚴重的歧視是在學習方面，阿拉伯學生要學習大量的希伯來文作品，包括希伯來文的宗教材料，聖經，猶太教法典，與及希伯來語及阿拉伯語的猶太復國主義著作，教可蘭經的時候只佔十分之一，而且還限於舊約部份。十七世紀後的阿拉伯作品是被禁制的。

「舊作品的選錄也是集中於歌頌自然美的詩篇，所有會被詮釋為具有民族性的詩篇，即使是非常模糊，也被禁制。大部份歐洲著作和所有亞洲著作，如中國古代的著作，也被禁制。他們要學的是希伯來語。當然又要用希伯來語來應付考試，如果不及格不能升學。」

在存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大城市，「有時候，阿拉伯人被批准送子女到猶太學校，但不會到他們本區的學校，而是到其他地區，另一條村的學校，在一班裏，一百個猶太人中會有一個阿拉伯人。這是非常特准的了。」

在大學教育方面，「來自四個孩子的家庭的猶太學生，可以得到大幅度減費，但阿拉伯學生無論是來自十多個孩子的家庭也得不到任何減費……」

「阿拉伯學生的入學是受到限制的。有一些學系，如地理學和地質學，是不收阿拉伯人的。另一些只招收幾個，這是公開的。學生宿舍更沒有阿拉伯人的份兒。」

在城市撥款方面也是一樣。每一個猶太城市得到的政府撥款的每年每人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以色列鎊，阿拉伯城市則是七至十鎊，這又是公開和合法的。

在就業方面，「不存在合法的歧視，但很難有阿拉伯人得到好工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主要是做三種職業，第一、非技術農場工人；第二、非技術或半技術建築工人；第三、服務性的低薪工作，如洗碗等。……」

「在這個中東唯一有民主的地方，我們還有一九四九年的防衛條例（附註二），軍方能用以拘捕，囚禁，或限制任何以色列人的行動。但這些條例只用來對付阿拉伯人，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包括那些鼓吹恐怖主義的，會被放逐或未經審判監禁，但很多鼓吹與猶太人合作的阿拉伯人則受到如此待遇。

六十年佔領區點滴

被以色列在一九六七戰爭佔領的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的情況就更多悲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掠奪，正以有計劃的形式在那裏重演。

一九六九年在 ROFD 有一千五百餘畝的土地被沒收。一九七二年一月，當地又有近一萬名農民和畜牧者被驅逐。他們的房舍、帳幕、穀麥被毀。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 AL JORR 部落的一千名成員被驅逐，三萬六千餘畝土地被政收。到七六年中為止，以色列已在佔領區建立了六十八個殖民區^③。最近比堅政府還宣佈計劃在二十年內在內西岸殖民二百萬，這些猶太人將要定居在政府事先劃定的「井」形的殖民網上，把當地的阿拉伯人分隔地一個一個的貧民窟^④。

那些被驅逐的阿拉伯人可能會在後來被送回原地方當殖民者的僱傭，使後者得到巨額利潤^⑤。

薩克教授的訪問記指出：「在佔領區的人民是完全沒有組織的權利的，一切委員會、政黨、組織、工會都被禁止。任何政治活動，甚至關於示威，也是禁止的。」

「在以色列，人們最少不會被放逐出境，他們會從一個城市放逐到一條村落，從一條村落放逐到另一條村落，但在佔領區，眾所周知，以色列民主的代表會在他們最喜愛的時間——零晨兩三點——造訪。他們可以只給那位父親半小時收拾行裝，帶他到約旦或黎巴嫩的邊境，放逐他離開家庭，禁止回來。可見，家庭復合只適用於蘇聯的猶太人，而不適用於巴勒斯坦。」此外，在佔領區，軍警暴力還遠較以色列嚴重。「在以色列出現毆打情況，也會是短促的，但據我所知，在佔領區的居民就慘受酷刑了。」

也不是猶太人的家園

對於以色列的大多數猶太勞動人民，猶太復國主義雖然維持了他們相對的特權，但也是他們備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出發點。左翼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往往在這方面提出批評。早在一九六九年美國的一份猶太復國主義刊物「以色列水平綫」有一篇文章寫道：「我是不能同意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如去年的情況）——銀行利潤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工業利潤高達百分之二十，但工人的薪水却維持不變，他們的薪金已凍結了多年。

「我恐怕社會和經濟的鴻溝會日漸擴大。保安是需要的，但以此為理由，兼把金錢和生命重擔強加在城鄉工人身上，但又不向上等階級要求強迫借款，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我深深不明政府把國有企業轉讓給私人公司和企業的第一步，他們甚至不迴避把股份轉讓給外國公司的念頭。」

直到今天，情況沒有轉好，而是更壞，擴大的非生產性的軍費支出和美元的下跌，導致以色列每年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四十。今年四月上台的比堅政府更開始了一連串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打擊，必需品的資助削減了百分之二十，對第一和第二孩子的家庭援助金被取消，公共部門開除了幾千名工人等等。

此外，以色列的二百萬猶太人也不是猶太民族的多數，在美國和歐洲就分別有五百萬猶太人。近年來，更越來越少猶太人移民以色列。蘇聯的猶太移民向來都是以以色列新居民的來源，七五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蘇聯猶太移民不前往以色列，七六年則有百分之四十七。最近有大量猶太人離開阿根廷，其中百分之九十不願前往以色列^④。另一方面，則有大量的以色列猶太人離開以色列，七五年的人數是一萬五千左右。以色列美國領事館從晨早五時便出現人龍，有百分之二十到美國旅遊的拒絕回國。七六年二月以色列的猶太人代辦處成立了防止移民出境部，開始限制猶太人本身自由選擇居留地的權利。

以色列國內的種族主義壓迫不斷地往外伸展，除了六七年進攻埃及等國外，其存在史還充滿了幫助帝國主義入侵中東的事蹟。

（第三版續）

「新鱷魚淚」

—帝國主義如何「救援」柬埔寨人民

夏楚



卡特政府、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正攜手進行一場本世紀最殘酷的罪行——有計劃地餓死超過二百五十萬的柬埔寨人民，藉此來達到打擊韓森林政府的目的。

與此同時，大量的武器和援助物資，在人道主義的名義下，運給殘餘的波爾布特軍隊和其他右翼的武裝力量。他們正聯盟反對韓森林政府和越南軍。

九月五日的「紐約時報」，坦白地將卡特的救濟計劃的真正面目供出來。該報駐曼谷的特派員甘姆報導：在柬泰邊境的殘餘力量「是透過泰國，在得到泰國軍方批准的情況下，接受國際的援助。雖然沒有任何政策公佈出來，但根據現場觀察所得，每一個武裝力量越能有效地反對越南軍，他們所能得到的食物供應便越齊備。」

十一月二日的「遠東經濟評論」亦報導，「紅色高棉」透過難民營取得國際援助已不是秘密，「當食物來到時，首先是留給戰鬥者，雖然他們沒有攜帶武器，但從相對其他柬埔寨人較壯健的體形來看，這些人是把救濟品帶回戰爭中的柬埔寨境內。」

所有在邊境的報導，都指出許多救濟物資都供給了波爾布特軍隊。他們衣食充足，但在他們控制下的平民，却營養不良和受虐疾所害而瀕於死亡。

當接濟波爾布特軍隊的工作，在美國、泰國和國際紅十字會的默許下並沒有遭到任何的障礙時，但對於救濟韓森林政府控制下的四百万柬埔寨人，却遭到帝國主義的阻撓和借故拖延。他們一方面特准泰國軍方全權控制在柬泰邊境分配救濟物資，默許這些物品落入波爾布特手中，但另一方面却堅持要嚴格控制在韓森林政府下的分配工作，並且拒絕利用越南貨車、海港和其他設備，致使救援柬埔寨國內人民的工作困難重重。極其諷刺地，他們認為這樣才可以使即使是一安士食物都不會供給反對波爾布特的軍隊和越南「佔領軍」。

最近美國政府突然大發慈悲，聲稱提供柬埔寨七千萬美元的救援，但條件是要韓森林政府開放「陸路橋樑」，使貨車能由泰國駛入柬境。當韓森林政府經過三日的考慮而拒絕後，卡特乘機宣傳韓政府不顧柬人民死活，阻礙救濟的工作。

這個漫天的謊話必須揭破出來。事實上，帝國主義才是想置柬埔寨人民於死地的罪犯。早在今年六月，韓森林政府的外交部長韓山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的訪問中，已表示柬埔寨政府已向各國際組織呼吁救濟柬埔寨人民，但只有「國際民主婦女組織」有積極的反應，

而其他組織，例如紅十字會却「只有許諾，沒有行動」。各國也以不承認「在越南控制下的傀儡政府」為理由拒絕施以援手。

當時，對柬人有較大規模救濟的便只有越南和蘇聯等一些工人國家。這正正揭破了中共和帝國主義所說的，越南將東國食物運返越南的謊話。一些報刊亦不得不承認，越南政府正要求在接壤柬境的幾省人民，省下口糧救援處於水深火熱的柬埔寨人民。

至於美國所聲稱除了「陸路橋樑」一途，再沒有其他有效途徑進入柬國的謊話又迅速被揭破了。十一月一日，「紐約時報」報導有五架運載救濟物資的飛機包括三架蘇聯機降落金磅遜機場，而BRITISH OXFAM——實際上唯一在柬境進行救援工作的國際組織——在十一月五日聲稱，其中一艘運載二千噸食物的船隻抵達金磅遜，並且受到韓森林的歡迎。BRITISH OXFAM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基督教科學箴言」的訪問時更指出：「來自好心人仕的救援再沒有遇到阻礙，我們要求並得到准許去分配所有由救濟團體輸入的救援物資。」既然越南、蘇聯和其他國際組織能夠在韓森林政府的合作下，利用現有運輸設備去救濟柬國人民，為什麼美國却認為不可行？為什麼美國能在七〇年代不斷派飛機轟炸柬埔寨，而現在不能派出飛機去運送食物呢？



意圖是十分明顯，一旦美國能夠通過交戰區輸送食物，不單可實際上支援波爾布特和右翼分子；而且由美國和聯合國軍隊「護送」食物，更是使帝國主義軍隊乘機再次踏足柬埔寨。

今天，美國和各資產階級政府突然成為「人道主義」的急先鋒，並不是件偶然的事。近期，韓森林軍隊和越南軍正值旱季，發動剷除盤踞在柬泰邊境的波爾布特和龍諾殘餘力量。救濟柬人的運動，正是帝國主義的口實以掩飾真正的政治目的。

十月，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求外國軍隊退出柬埔寨，各國亦乘機將柬國的飢困歸咎於越南政府的「擴張主義」，号召各方面停火，組成一「獨立自主的柬埔寨政府」。

此呼吁實際上是要柬埔寨人民放下武器，把殺害百多万柬人的劊子手波爾布特和帝國主義的傀儡龍諾殘餘迎接回柬埔寨，換言之，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七五年被越南革命所驅趕後，可乘機重新踏足於印支半島上。

造成今天柬國人民瀕於死亡邊緣，五歲以下的兒童和懷孕的婦女的稀少，種種的苦況，最終分析起來，都是美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在七〇年，美國為要剷除與越南軍携手的赤柬，對柬埔寨施以瘋狂的轟炸，使柬國大部份國土變回「石器時代」。當柬共在七五年上台後，所實施種種滅絕人性的措施，實在是罄竹難書，在波爾布特統治的四年中，超過一百万的柬人被殺或因飢餓而死亡；但帝國主義至今却仍支持早已民心盡喪的劊子手，使他們避免被消滅的命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政府，都在反對越南「佔領」柬埔寨的名義上團結起來，也藉此作為秘密支持波爾布特的口實。但柬埔寨經過帝國主義多年的轟炸，再加上波爾布特四年的恐怖統治，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和專家，殺的殺，逃的逃，甚至一些漁農作業工具，也在消滅個人主義的理由下被摧毀。面對着殘破不堪、百廢待舉的國家，一些到訪柬埔寨的外籍人士，也不得不承認目前越南所提供的科技人員和經驗，正在使新政權初步走上軌道。特別目前對反動部隊作戰的時候，越南軍隊的參與更是決定作用。「遠東經濟評論」在高棉市的訪問中，不少柬人也表示，如果越南軍遲數個月才進入柬境，恐怕自己早已死了。也有些表示，越南軍隊的介入，在抵抗波爾布特的時期是需要的，但希望戰爭結束後越南能退出。

由於目前的戰爭，過去作為產米國的柬埔寨，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目前仍可耕作，而明年播種期的穀種至今仍缺如。情況如不改善，飢餓將會延至明年。帝國主義對波爾布特和右翼分子提供援助，只有使柬埔寨戰爭繼續延長，使柬埔寨人民的苦難更進一步。

訂閱

全年十二元

你一定已發覺很難在報攤上找到「新思潮」。原因很簡單，這個社會是以金錢掛帥的，我們的刊物銷量有限，利錢不高，很多報販不是拒絕寄賣，就是將它放在不當眼之處。

保證你每期可以看到「新思潮」而又省力的辦法，就是立即訂閱。

填妥下列表格寄回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姓名：

地址：

越南的社會主義革命（二）

作者：Fred Feldman
譯者：夏楚

勝利

西貢軍隊拒絕作戰，許多索性逃回家，有些則投向「人解」，只有少部份繼續執行屠殺越南平民的任務。

長期的戰爭眼看快可結束，越共軍隊向前推動攻佔了許多大城市。解放軍每到一地區都被當地居民視作解放者。

美國並沒有死心。福特要求派軍隊「保護美國僑民」。海軍應召開赴越南沿岸。五角大樓建議派九萬軍隊「救援」美僑和越南人民，以避免美國所預期的共黨大屠殺。

但國內反對直接介入的力量，迫使美帝只能撤走駐在南越的二萬軍事顧問。

華盛頓郵報記者報導：「一個小時內，街道上充滿了節日的氣息。」不用說，經過一個世紀帝國主義的佔領和差不多二十多年的內戰，現在終於結束了。越南人民取得了歷史上的勝利！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人解」和北越戰勝了美國支持的西貢政權，城市裡的工人、學生、鄉村來的難民們都喝采起來。越來越普遍的支持證明了所謂一個臨近的「共產主義屠殺」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捏造出來的謊言。

許多措施——像釋放二十多萬名華盛頓製造出來的獨裁政府下的政治犯，給需要者以免費的糧米分配等——都得到普遍的歡迎。

當時，西貢的操縱權在由十一人組成的軍事管理委員會手裡。為了建立新的行政體系，在五月三日新政權呼喚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

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華盛頓郵報的一個通訊員評論說：「每一處都成立了許多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公共安全委員會、……」

「每一處我們都看見群眾政治動員的徵象，學生和青年們在『人解』的旗幟下開會。……」

「在市區邊緣，各社會階層混雜的住宅區裡，從前有權勢的人眼白白看着權力轉移到工人階級手中去，工人們好像突然的團結起來了。」

工人們行動起來了

西貢的工人（市內大約有三十萬產業工人）在舊政權的垂死一刻、新政權誕生之時行動起來了。在「人解」的幹部領導下，工人組織了委員會，防止逃亡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搗毀工廠，同時試圖恢復停頓了的工業。

五月二日，三千名工人佔領了支持帝國主義的工人聯會的總部。軍事管理委員會宣佈成立一個新的工聯會。

一名意大利記者報導說：「初時，西貢的工廠的情況還很混亂。新政權曾向廠主保證『產業資本家和商人的產品將受保護，他們能夠繼續進行有利國民經濟和民生的活動』。但在個別的部門裡，工人索性宣佈佔領工廠，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人民公審老板的情況。」

「有些工廠——像「鷹牌電池廠」和阮文紹夫人佔有股份的工廠——的廠主跟美帝國主義者一同遁去之後，工廠便被工人和僱員的革命管理委員會接管了。」

「根據軍事政權宣佈的方法，委員會將接管工廠『直至法定的廠主回來為止』。但由於廠主是永不會回來的，這無形中造成了初級形式的國有化。」

「中越合資的小企業中也發生同樣的情況。」

新政權佔有了國內70%的工業——其中包括廠主廢棄的、工人佔領的和原來屬於西貢政權及美國公司的。餘下的30%企業的廠主只希望在與工人委員會的角逐中，政府能幫他們一把。

「人解」的發言人好像被城市居民和軍官的革命熱情薰陶了。電台宣佈國家已統一了，所有工業、農莊、商業都國有化了。可是這些命令很快就被新政府的高級官員收回了。

為了控制群眾運動和在群眾基礎上建立新的行政體系，「人解」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袖唯有依着群眾的情緒辦事。但他們很小心的、不讓任何有規模的群眾委員會擁有政治決策的權力。通過越南共產黨和軍人幹部，他們控制着這些委員會，並在討論中定下不可超越的界限。

可是，街坊會和工廠委員會不單是吸納群眾運動的工具，它們更讓工人和窮人採取改善他們命運的措施。

帝國主義者的破壞

可是，越南人民始終面對許多的難題。越南——南與北——是一個遭戰爭蹂躪的國家。

數以萬噸計的美國炸彈投在南越的市區和整個北越之上，留下了二百六十萬個砲彈洞。在一度是肥沃的土地上埋藏了數千枚未爆發的炸彈。數千畝的稻田和樹林給有毒的、造成癌症的化學藥品破壞了。

數以千計的居民和軍人殘廢了。同樣數量的孤兒需要社會的照顧。

消除吸毒和賣淫——美國在南方做成的社會罪惡——需要一個巨大的康復計劃。

在美軍佔領期間，南越的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數以萬計的人民被美國的轟炸部隊迫得離開家園。許多人迫於為西貢官僚、軍隊和美國佔領者服務。在政權倒台後，失業人數由一百五十萬上升至三百五十萬。

美國取消了所有援助計劃和華盛頓施行的經濟堵塞，很快給新政權帶來許多困難。許多以前需要依靠美國原料入口的工廠現在要倒閉或減產。

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進程

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層，非但不發起一個大規模援助越南的國際性運動，反而以戰爭已結束為藉口縮減他們的援助。這給華盛頓顯示了官僚層並不對越南的革命勝利負責，這也是尼克遜的外交政策所希望防止的。

北京要求給南越賴以生存的穀物入口付出代價，莫斯科改為貸款利息，不給越南無償的援助。

帝國主義的經濟堵塞與河內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友人的反目無情，是構成越南經濟恢復極其緩慢的主要因素。

戰後的越南，只有一個國有化和有計劃的經濟——不是由資本家、地主、大商家操縱的經濟——才能平均

地分配有限的資源，以及動員重建國家的力量。同時，他們知道這個宏偉的任務，若果沒有國外的經濟上和技術上的大量協助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

可是越南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依循着他們在革命中追求了三十多年的階級合作的道路——採取了一個不同的策略。他們採取了「人解」的綱領，答應保存資本主義，並拖延統一全國的日期。

他們的基本願望是美帝國主義會實踐它在巴黎和約的諾言，給越南民主共和國以三億二千五百萬元的新建經費。他們也致力於贏取日本、法國、瑞士、美國的援助貸款和投資——尤其是發展越南沿海的油田。

基辛格的餌物

在四月二十八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基辛格答覆記者的詢問：

問：你同意美國政府援助北越的重建嗎？

答：不，我不願意美國政府援助北越的重建。

問：那麼南越呢？

答：說到南越，那要看冒出頭來的政府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不過，現在說來，我們反要看看南越是否能繼續存在了。

美國既不願援助北越，還力圖向北越施加壓力，要北越保留南越的資本主義。

西貢的商人在經濟中保有重要的位置。這些商人一直以來「控制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出口和交通孔道。他們更擁有稻米、肉類、衣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專利權。」

一個反民主的政權

越南共產黨宣佈了一個農民與地主、工人和資本家進行「國家妥協」的紀元。可是這些反動的階級合作論者的美夢並沒有實現。一九七三年巴黎和約後，「國家妥協」的說法在階級鬥爭中粉碎了。國內基本的矛盾一面是工人階級和他的同盟者，另一面是支持美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為了執行階級調和的政策和保持共黨幹部的特權，唯有建立一個沒有工農民主的獨裁政體。這個政體跟北方的反民主政體一式一樣。

人民建立一個支持革命、但批評共產黨的權利被剝奪了。人民也沒有出版的自由，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裡漸漸受到斯大林式的束縛，政治決策成為官僚機器的專利，人民沒有選舉的權利。

雖然被迫撤回直接的軍事介入，美帝國主義者（通過諸如中央情報局之類的機構），繼續支持泰國的地主——資本家政權，與老撾和柬埔寨的反動的右翼軍事力量。他們更以經濟和外交上的討價還價來說服北京給河內以外交和軍事上的壓力。

越南共產黨的領袖們吃下了基辛格的餌物。為了得到美國的援助，越南共產黨的幹部們不去發動起全球數以萬計的工人和青年的同情和團結，迫使帝國主義者大解善囊。

他們反而極力說服福特、基辛格和他們的承繼者：南越的新統治者並不是要進行一次社會革命，也不是要把革命擴展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去。這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政策也給南越的領袖以時間來阻壓伴隨着反帝革命而來的革命性騷動。

幾乎所有越南人民都以為在「人解」勝利後，越南已實行統一了。這種情緒在南方和北方的共產黨合併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和「人解」的軍隊聯合起來了，和數以千計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官員轉到南方之後更為明顯。可是，越南共產黨事實上不願意進行迅速的統一。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UPI的通訊員亞倫·莊生報導說：南越和北越的官員說統一是至少在五年之後的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臨時革命政府委任軍事管理委員會為南方的統治機構。臨時革命政府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成立的，它本來是用來吸引那些願意組成聯合政府的資產階級的，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被它吸引而來。

雖然河內的領導還是最後的執政者；可是，當形式上把權力交給臨時革命政府還要稱之為聯合政府。這個政府自覺地保存剩下來資本家、商人和「愛國」地主的財產。它的政策不但保存了南北兩個獨立的政府，也維持了兩個根本上衝突的社會制度。

越南共產黨書記黎筭在他五月十五日的演講中宣佈了這個決定。他宣佈北方仍然推行「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他建議在南方成立「一個民主的政體，一個繁榮的民主經濟體系。」

（待續）

